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3~60

2013 年 12 月 16 日

“亚洲有事”与“中国道路”

中信泰富经济研究部特约研究员 黄晓京

中国这个曾经在 19 世纪末“沉睡的雄狮”，在近现代化过程中觉醒，大约 100 年之后业已成长为“东方巨龙”。如今这个国家的首脑，将与统治着 20 世纪的美国面对面地讨论这个世界。中美两国的角力正左右着亚洲与太平洋的前途命运，这也宣告着一个时代的到来。¹

一、迎合还是自主？这是一个问题

历史上的“东西方关系”似乎总是反向而行。除了“轴心时期”² 的

¹ 〈中美首脑会谈 — 比竞争更重要的是对共存的思考〉，《朝日新闻》2013 年 6 月 7 日。

² 雅斯贝尔斯 (Jaspers, Karl Theodor 1883~1969) 提出一个“轴心时代” (Axial Age) 概念，即公元前 500 年前后，古希腊、以色列、印度也出现了像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释迦牟尼和犹太先知。前无古人的文化创新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。“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，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，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” (雅斯贝尔

东西方文明奇妙的相似期之外，秦帝国建立“郡县制”统一的“韦伯式国家”，³ 西方是罗马帝国的“征服国家”，其解体和演变为欧洲贵族封建，却是先秦“封建”的国家形式；唐宋时代“中国近世”（early modern），⁴ 变贵族制度为皇权之下的身份自由“世俗”平等，完备科举取士的文官制度，市场经济发达，甚至扩张为亚洲的“中国世界”，欧洲陷入中世纪的“一神教”和贵族制的“黑暗年代”，尚需个性自由的“启蒙运动”；17~18世纪之后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旺发达，东方这边衰落为“野蛮落后”，需要西方殖民地“文明开化”。大英帝国的霸权时代的诗人吉卜林写道：“东方是东方，西方是西方，两者永远不会交汇”（Oh, East is East, and West is West,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）。⁵

涉及“东西方关系”的“反向性”或者灾难性的一面，这句名言依然有效，而在“东西方关系”有效互动的进步意义上，这句话或许已经过时。

风水流转到21世纪，美国欧洲日本，“主流世界”发达国家“俱乐部”开始陷入困顿，腿脚乏力，经济重心再次东移。西方“帝国传统”，强势者用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，而历史文明沉积深厚的中国，似乎难以

斯：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，华夏出版社1989年，第14页）。中国思想史上，确有和西方一样的一个“轴心时代”：春秋战国，公元前500年前后，诸子出世，百家争鸣，思考自然、人类社会的本质问题，智慧之光超越时代延至今日未衰。在交通不便，信息远隔的时代，无法举办什么国际论坛，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，各自独立发展，并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。

³ 福山概念，指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，基本特征是“官僚制”。

⁴ 内藤湖南（1866~1934），日本东洋史学者，名虎次郎，字炳卿，号湖南，别号黑头尊者。和白鸟库吉同为代表性的东洋史学者，京都学派的代表。他提出的“唐宋变革论”认为：“唐代是中世的结束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”，即唐宋之间的变革是中世向近世的转变。围绕唐宋变革论，日本学术界展开论争，贯穿于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，并影响到中国学界，近世的英文是 early modern，近代是 modern，这个区分在中国史上意义还存在争论。

⁵ Joseph Rudyard Kipling, 1865~1936年，英诗人、小说家，长期生活在印度，1890年代在英语世界家喻户晓（见德国学者卜松山著：〈作者自序〉，《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》，刘惠儒、张国刚译，中华书局2000年）。

“归化”，至今还是西方近代“民族国家”的“异类”，没有实现“普世价值”。所以，中国的一切都引起世人的兴趣，评头品足，众说纷纭。非西方国家中，“维新”“归化”西方美国的“主流”并取得成功的，据说唯有一个日本——“东方的西方”。时至今日，日本出来对中国叫板对立，中日关系陷入僵局，可谓顺理成章，绝非一朝一夕之事，一岛一山之争。从“东西方关系”的实力变化、制度形成和历史的长期的逻辑来看，中日纷争，一发全身，或许标志着“东西方关系”，或“主流”和“非主流”再次到达一个历史性的拐点，或许是一个新的“轴心时代”，两边都在思考“社会的本质”和发展“道路”的“本体论”问题。

这个历史运动的思想考察，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，而离开历史和哲学的思考，则无法理解眼前的历史运动。被称为“日元先生”的榊原英资，在他最近出版著书和谈话中，⁶和“亚洲的哲人”马哈蒂尔当年反复说“look east”一样，描述着我们的这个世界如何正在“重归东方”

(Re-oriental)，并肯定中国“异类”的历史合理性。在日本之后，美国金融危机，可能进入“失去的十年”，“美国时代的终结”，欧洲从一体化步入解体危机，中国和亚洲复兴，2050年的中国，可能在经济上超越美国。关于中国体制，他认为，所谓共产党的“政治独裁”，本质上是和日本自党民一样的政治系统，行政体制操作则类似“明治维新”。中国是一个巨大的“官僚国家”，经营着一个“国家资本主义”的经济体。如果主要经济体，也即“主流世界”（本文中“主流世界”，相对于“非主流”或“异类”中国及“中国世界”概念）不进行“非市场化”的改革，世界经济可能进入类似于1930年的“世界同时经济恐

⁶ 榊原英资：《通货解读：世界同时恐慌》，（日）ASKOMU 株式会社 2012 年；《日本经济的答案》，（日）ASKOMU 株式会社 2012 年，原文均为日文。榊原英资，1941 年生，东京大学毕业，密西根大博士，IMF 经济学家，大藏省国际金融局长，1997~1998 年任日本财务官，被称为“日元先生”。后历任庆应大学教授、早稻田大学教授、青山学院大学教授。

慌”，导火线或许就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危机或者停滞。1929~1930年，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危机通过战争得以摆脱，战争成为最大的经济刺激，而在存在核扩散危险的今天，大规模的战争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，不过局部性战争或许不可避免。

和“日元先生”的思想相反，“主流”思想界并不如此看好中国的未来。最近就有几本书，讨论为什么中国难以成为“一流强国”。比如，蒂莫斯·比尔德森（Timothy Beardson，中文名：谭宝信）写了一本《蹒跚的巨人：威胁中国未来的因素》（*Stumbling Giant: The Threats to China's Future*），他写道：“中国取得经济突破的机会窗口大概20年，十分有限，错过机会就有可能陷入‘中等收入’陷阱。可怕的人口数量加上保守、不愿改革的领导层，使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世界领导，或具备超级大国的地位。……到2030年，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比整个美国人口还多，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，这样的下降趋势在未来会很剧烈，而且难以控制。美国、日本和韩国，当初在达到类似中国今天的老龄化水平时，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都在1.5万美元左右，而中国2011年的数据大约是4300美元……中国会继续崛起，但是威胁太大太广，而其国内政策反应又太过谨小慎微，很难想象中国会在本世纪超越美国”。因此，作者认为，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，即适应或顺应（adaptation）。而且，“中共从1978年以来，展示了非常有效的适应能力，得以度过1989年天安门民主事件，1997年金融风暴等一系列可能导致政权垮台的事件”。……“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不断地‘适应’和调整。倘若一旦停止‘适应’和改革，垮台几乎是定局。”另一位美国的中国专家沈大伟（David Shambaugh），在《中国走向全球：不完全大国》（*China Goes Global: The Partial Power*）中，对中国的优势和劣势进行最全面的审视，他的结论是：“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要素实际上弱得惊人，而且非常不均衡……中国不像人们普遍认

为的那样重要，也肯定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”。⁷ 而按照鲁瓦克 (Edward Luttwak) 的说法，现在的中国一方面发展经济，一方面扩建军力，可能会患上“大国孤独症” (great state autism)，就是说，其他势力可能会携手反制中国，仅仅日本、印度和越南三国，实力就可能超过中国。⁸

异常的被关注，来自于“异类”的“历史不终结”，虽然不大符合中国的“韬光养晦”。冷战时代社会制度的对立，归结是前苏联的解体，全球一体美国化，资本主义的“历史终结”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美欧日发达国家成为唯一的“主流世界”，即一个由“自由市场体系”和“宪政民主主义”的两个车轮支撑的世界体系。除此之外，亚非拉美其他“国家形式”皆为“非主流”，在理论上皆为“转型国家”，包括“去社会主义”当然也包括中国。20 余年之后，历史不仅没有“终结”，而且获得“全球化”胜利的“主流世界”，在虚拟资本主义“新经济”登峰造极之后，开始走向反面，2008 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是一个标志。相反，本来只是“转型”国家，甚至于在政治危机中可能走向“崩溃”的中国，以市场经济“武装”起来，在没有“民主主义”的“单轮”体制下飞行，竟然实现了连续多年的高度增长，并成为第二大经济体。

“东西方关系”或者“主流”和“非主流”关系，正在出现微妙的逆转，尽管关于中国的未来，有上述两种不同的看法。英国首相卡梅伦近来爱用“清贫的时代”一词 (Age of Austerity) 来描述西方的现状，这个词在美国也流行起来，不过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”。“两个轮子”的制度优势，特别是美式“武装的民主主义”，依然纵横天下，从伊拉克、阿富汗、到利比亚、叙利亚，收拾了中东、北非、大大小小“非主流”，

⁷ 上述两书只读到书评，尚未见到全书，参见：<http://www.afinance.cn/new/xzgd/201307/591227.html>。

⁸ Edward Luttwak, *The Rise of China vs. the Logic of Strategy* (可参见哈佛出版社介绍：<https://www.hup.harvard.edu/order/ca.html> 和本人视频：<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eLmk9IceqJQ>)。

造成一系列的“民主运动”，比如埃及的动乱。“主流”要“改造”世界，经济“全球化”和政治“非主流”的中国在被“改造”之列。“中国道路”、“特色”、“模式”概念混乱，没有前例说不清楚，只有其上升的实力使“主流”既感到“机遇”也感到“恐怖”。战后以来“甘当老二”追随美国的日本，经历长期的经济衰退，在用一种“没落贵族”的心态紧盯中国这个“暴发户”，并炒作出一个东海钓鱼岛危机。

这就是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。自中国经济“接轨”全球化以来，经济、政治、思想，或许还有治国理念，深受“主流世界”的影响和制约。一厢情愿地加入“主流”，改造自己的“国家形式”（可略称为“国形”），成为中国的“主流”思想。如此这般，则中国“特色”、“模式”、“道路”不过是一个“过渡期”，目的地还是“主流”的“国家形式”，否则，一个“单轮”的“非驴非马”的“异类”的社会制度，最终无路可走。中国人正在十字路口徘徊，一头是清楚明白的“主流世界”，市场和民族国家加宪政民主，另一头是不知深浅的“中国道路”，左派右派站在那里，争论不休，何去何从，难得共识……在国家战略问题上，好像出来了一个哈姆雷特：迎合还是自主？这是一个问题。

没有正确的世界观、历史观，就没有正确的国家观。中国面临的挑战，不仅来自“东方的西方”和“主流世界”，也来自中国自己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特立独行之人令众人侧目，何况一个“异类”大国。“韬光隐晦”者，个人立身可也，国家“立身”则问题多多。中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增长，中国的“国形”和“道路”能否成立，不仅关系中国的未来，也关系到一个超越“主流世界”的新的国际秩序能否成立。30年改革，一直存在王小强提出的那个问题：“摸着石头过河，岸在哪里？”

“方法论”清楚明白，“本体论”说不清楚，也没有现成的“经验”和答案。面对中国与“主流世界”合作、摩擦、甚至对立，以及“主流”和“非主流”的思想冲突，笔者这里选择一个切入点，即日本如何成为

中国“周边有事”的主要因素，成为挑战中国及其“道路”的马前卒，略加分析，借此提出一个“中国道路”及“国家形式”如何应对挑战，以及中国“异类”如何具有的“普世”意义的“问题意识”。

二、日本“反美者必速亡”

近代以来，东亚的两个核心国家、中国和日本也是反向而行。日本从鸦片战争得了教训，“脱亚入欧”、“文明开化”、宪政民主、侵伐霸道，完成“东方的西方”统一的“民族国家”的转型。对于为什么是日本而不是中国首先实现现代化，历史学家举出不少理由，比如前近代的日本藩阀武士制度，更接近欧洲的封建制度，比如江户时代的思想运动，完成了“现代性”的转型等等。当然回答也可以是，因为一贯地占中国的便宜，或者和中国分离走向另外一条“道路”。“东方的西方”修到了西方文明的精髓，排他性的侵伐霸道，殖民扩张，将“经营”中国大陆定位为日本的国家战略。“老大帝国”落后保守，甲午一战，丧权辱国，使两个国家的强弱关系逆转。中华民国在列强夹缝中求生，内部四分五裂而且镇压共产党，好歹有一个所谓“黄金十年”（1927~1937年），却再次被卢沟桥的枪声打断。紧跟“主流”的“日本帝国”称霸东亚，三亿多人臣服“天皇”，直到和主流中的未来霸主美国开战，中华民国历尽艰辛才勉强成为“同盟国”的一员，收复失地，废除不平等条约，走的也是“主流”路线。战后中国共产党夺得天下，再加上朝鲜战争，日本和美国化敌为友“甘当老二”，成为“亚洲冷战”的桥头堡，继续和中国反向而行。麻生太郎副总理“大嘴”，历史上日中关系好的时候不多。……

时至今日，中国和亚洲的复兴，既依赖“主流世界”既存体系和规矩，又冲击“主流”的利益格局，“东方的西方”似乎首当其中。在产

业链上，日本领头“雁行”走了一个时期之后，很快感受被“赶超”的危机，并反应到政治思想上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美日两国同年成立民主党政权（2009年1月奥巴马政权，2009年9月鸠山政权）。同年8月日本众议院选举，民主党获得三分之二的席位，大获全胜，鸠山~小泽主政（2009年9月16日~2010年6月8日）。民主党政权提出了新观念，他们认为，世界正从美国的“单极时代”走向多极化，相应的是美日同盟的“相对化”；从日本的长期利益出发，唯一的出路是“回归亚洲”，即“脱欧（美）入亚”。一个明治“脱亚入欧”战后“甘当老二”的国家，从原来所隶属的“主流世界”“回归”他们一直脱离的“非主流”，自然触及各方面的利益，最重要是触及到美日同盟。⁹学者型政治家鸠山和实力派政治家小泽，觉察到中国和亚洲的将来性，却没有充分地预料到这个“新思想”所引发的严重后果，就像后来美日“主流”舆论指出的那样，鸠山和小泽破坏“日美同盟”的“基轴”，甚至恢复“朝贡外交（小泽曾率领150名国会议员访问北京）。新政最初获得70%的民意支持，但是所谓“反美亲中”的路线，深深地得罪了美国，特别是冲绳“普天间”美军基地“县外”转移，和小泽“第七舰队撤出日本”之说。于是一堆难题和丑闻暴露出来，杂烩政治理念的民主党内部大乱，逼得鸠山~小泽相继辞职。当然，这才是一个开始。美国不宽容反对“自民党一党独裁”的民主党，而离开“老大”的支持，其政权也注定了短命。¹⁰

鸠山之后，民主党支撑了二年半。菅直人当政时期（2010年6月8日~2011年9月1日，中间两次改组内阁），开始“修复”对美关系。不过，因为2011年的“3.11大地震”和福岛核电事故，他几乎无暇顾及外交，启用伊藤忠会长丹羽宇一郎出任驻中国大使（2010年6月~2012

⁹ 笔者在〈东亚共同体的挫折〉一文中，描述过鸠山的“愿景”和失败（见黄晓京：〈东亚共同体的挫折〉，《香港传真》No. 2010~48，大风网站 www.hkstrongwind.com）。

¹⁰ 植草益文章：<http://uekusak.cocolog-nifty.com/blog/2010/01/cia-a85b.html>。

年12月），用意在于推动经济合作，可以说是民主党对华政策的一个政绩，丹羽年轻时参加反日美安保斗争，后来主张“大中国圈时代”的到来。2010年9月7日“撞船事件”发生，9月24日，日本释放中国船长。围绕五平方公里的钓鱼岛及其周边列岛，日中之间因为领土主权、“搁置默契”有无，关系空前紧张。商社出身的大使，也未能发挥其经济之长，成了“钓鱼岛大使”，他自己遗憾和无奈地说，他是“从尖阁开始到尖阁结束”。¹¹ 在处理福岛“核电危机”时，菅直人也触及到日美同盟。核泄漏的扩大，欧美人士纷纷回国避难，驻日美军及家属人心惶惶。如果日本无法控制核污染的扩散，美国不得不考虑撤出，甚至出现日美同盟“自然解体”的说法。美国要求介入事故处理，派专家入驻首相官邸协助救灾，民主党则以国家“主权”加以拒绝，据说官方长官枝野幸男和美国大使为此争吵，美日关系再受挫折。

菅直人之后，野田佳彦内阁（2011年9月2日~2012年12月26日，期间三次改组内阁）加速了“回归”美国的步伐，并企图和美国一起主导“太平洋宪章”，以日美为中心建立一种类似“大西洋宪章”那样的国际秩序。但是，政治历史的编写权已经不在民主党之手。2010年10月24日，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电视访谈中，披露了自己在和“地权者”（栗原国起）接触，要从他手里“购买”钓鱼岛、南小岛和北小岛。¹² 华盛顿的“传统基金会”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（Walter

¹¹ 丹羽宇一郎：〈日中外交的真实〉，《文艺春秋》2013年2月号。以及他最近的著书：《北京烈日——在中国思考2050年的国家展望》（其概要可参见：<http://hon.bunshun.jp/articles/-/1617>）。

¹² 福冈实业家古贺辰四郎（1856~1918年），据称最早“发现”台湾附近的钓鱼岛及附近岛屿，向冲绳政府申请开发，冲绳无法判断，报告明治政府，当时的伊藤博文、山形有朋、陆奥宗光等下令调查。1895年，日本政府派人前往钓鱼台调查，结论是说该岛不属于台湾也不属于中国，是“无主岛”。同年《马关条约》签订，割让台湾，钓鱼台同年也被“编入”冲绳县。1896年，日本政府免费租借钓鱼岛、黄尾屿、北小岛和南小岛给古贺，1909

Lohman) (他曾辅佐共和党政治家赫尔姆斯 Jesse Alexander Helms, Jr 和约翰·麦凯恩 John Sidney McCain, 皆为对中国强硬派) 和 CIA 出身的布鲁斯·克林纳 (Bruce Klingner) 研究员, 在东京和石原会面, 邀其赴美演讲, 并作出安排, 石原表示愿意在美国最著名的保守派机构演讲, 但是据说美国人事先不知道他要讲什么。2012 年 4 月 16 日, 石原在“传统基金会”演讲, 其中突然涉及钓鱼岛问题, 并当场宣布, 他已经和钓鱼岛地主达成协议, 东京都将“购买”钓鱼岛, 并通过港湾设施建设, 强化日本的“实效支配”。石原渲染说, 住在埼玉县的地主不喜欢政府, 因为当年土地改革, 政府曾强行没收土地, 有外国人 350 亿日元买岛, 地主如何不买, 要留给子孙, 而私有总有它的限度, 石原知事可以信用。石原“爆炸发言”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。他号召市民集资, 到 2012 年 8 月 14 日集资 14 亿日元, 并向政府申请“登岛”调查。在“购岛”喧嚣声中, 2012 年 6 月 7 日, 丹羽大使在北京接受《金融时报》(FT) 访问说, 如果日本实施购岛, 日中关系将面临严重的危机。此言一出, 遭到日本政官界和媒体的集中攻击, 野田政府“被动防卫”, 导致丹羽被撤换。实际上丹羽此举暴露了日本政府立场的矛盾: 既然敢说钓鱼岛是“固有领土”, 又不得不承认此事恐“触及”中国的核心利益, 那么为何不承认存在领土争议? 为何容忍东京都知事胡来?

应该说, 石原出手, 一击中的, 时间和地点的选择, 深思熟虑, 民

年他因养殖业的功绩获得勋章。1918 年古贺逝世, 其子古贺善次接管。1932 年, 古贺善次购买钓鱼岛等岛屿, 1940 年钓鱼台上的居民离岛, 再成荒岛。1945 年日本投降, 美国军事统治冲绳, 1952 年旧金山条约生效, 钓鱼台仍归冲绳管理, 与古贺善次签订租赁合同并征税。1969 年联合国调查认为钓鱼台及周边海域有潜在的石油和天然气贮存。1971 年美国和日本签《归还冲绳协定》, 将琉球群岛及钓鱼台等移交日本政府。在美国支配时代, 古贺家要向美国支付每年一万美元的土地使用费, 一直到 1972 年冲绳归还。古贺善次 1978 年去世, 其妻古贺花子等将钓鱼岛、南小岛、北小岛卖给埼玉县的栗原弘行, 现在的“地权者”是栗原弘行之子栗原国起, 石原“购岛”后成为“媒体名人”。

主党野田政府不是对手。有人发问石原，“购岛”之后如果中国海军接近钓鱼岛如何应对，石原胸有成竹地说，那是政府的事儿嘛。而野田政府事先准备不足，穷于应付，只得“三面出击”，既要对付美国、中国，又要对付石原。2012年5月18日，野田团队（藤村修官房长官、长滨博行官房副长官、长岛昭久首相辅佐、佐佐江贤一郎外务次官、河相周夫官房副长官）密会，商讨对策。野田表示，钓鱼岛问题向“国有化”方向考虑对策，内在的含义是东京都知事无权处理外交问题。当然，这也是野田团队进言的结果：只有阻止东京都的计划，将钓鱼岛“国有化”，防止扩大事态，缓和中国压力。为此，他们四处活动，探讨美、中、石原三方面的口风，核心是中国的反应。2012年5月13日，中日韩首脑会谈，他们已经向中国总理及外交领导试探，居然得出了钓鱼岛未必触及中国“核心利益”，日本政府“购岛”比石原“购岛”要好，可以“平稳安定地”维持“实效管理”的结论。2012年8月19日，野田和石原在首相官邸秘密会谈，石原对政府“购岛”表示同意，条件是日本政府必须强化“实效支配”，并没有涉及他自己的过激主张，比如自卫队驻军，最多是要求政府同意设立灯塔、气象观测站、渔船避难所。众所周知，石原的一贯主张是和中国不惜一战，常规战争可以打败解放军，被野田的军事幕僚、原统合幕僚长（参谋长）评为“极端危险的言论”，在这里他后退一步，无非是逼野田决断。¹³ 2012年9月9日，在APEC首脑会议上，胡锦涛和野田站立谈话15分钟，胡主席要求日本认识事态的严重性，在上述背景特别是国内压力之下，野田轻描淡写回应了几句“大局观”处理。回国之后的9月10日，立即“阁议”决定实施“国有化”，9月11日完成20.5亿日元购买钓鱼岛、南小岛、北小岛（2002年起日本政府每年2400万日元租赁）的交易，以及“所有权转移登记”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个会议只有官房长官、财相、外相、国土交通相，野田

¹³ 春原刚：《暗斗：尖阁国有化》，（日）新潮社2013年。

自己却没有参加，或许刻意低调为日本国内的“地产转让”，和外交无关。造成既成事实。中国又能如何？况且美国已经承认，钓鱼岛属于日美同盟条约的适用范围。

这是一个既表现中日美战略博弈，又表现日本政治行为方式的典型案例。涉及对美对华关系，反美的、民粹主义的石原坚定不移，攻击一点，全局震动；“亲美”的、草根的野田首相，被动应对，首鼠两端；美国则不露声色而一举多得。日本政客之间，互动方式复杂，石原抢占先机之后，野田的心态是变被动为主动，一方面取悦投票者，一方面表现对华强硬。其幕僚事后反省，不如先由石原东京都“购岛”，日本政府居中调停，或许更有和中国的缓冲余地，悔之晚矣云云。另一方面，在这个案例背后，依然隐藏着诸多疑点。比如，曾以“对美国说不”而著名的石原，为何特意选择“传统基金会”那样“新保守主义”的地盘宣布“购岛”？比如，野田的“单边决策”的背后，事先有无和美国商量？事实上，美国对此事高度关注，2012年7月8日，助理国务卿库尔特·坎贝尔（Kurt M. Campbell）曾和首相辅佐长岛会谈，要求详细说明日本政府的“购岛计划”，据说坎贝尔多次打断他的老朋友的叙述，评论说，有那个必要吗？……围绕这些疑点，媒体“CIA阴谋”之说不胫而走，美国一箭双雕，既离间中日关系又叫日本民主党垮台。在笔者看来，其实已经不是什么“阴谋”而是“阳谋”，石原和野田正好是一盘大棋上的棋子，区别只在有的主动，有的被动而已。

2011年11月12日，上台两个多月的野田访美，旨在“修复”日美关系。除了大谈篮球和甲壳虫音乐邀宠之外，在两个难题上，他对奥巴马总统示好，一是美军“普天间”机场搬迁问题，他用隐晦的方式表明，日本政府将继续努力，创造向名护市“边野古”搬迁的环境；二是日本将参加 TPP 谈判；依此想得高分，进一步推进“太平洋宪章”，美日同盟，领导亚太。据美方报道，在这次首脑会谈中，野田首相表示，

“所有的物品和服务贸易，其自由化问题都可以放在谈判桌讨论”。其后，日本政府赶紧出来说，没说过那样的话，强烈要求美方订正，被美方拒绝，至今也是真相不明。不过，野田的举措已经意味着民主党完全放弃原来的“公约”，即2008年在大选中鸠山民主党承诺，无视自民党与美国达成的冲绳县内转移的协定，将美军基地至少搬出冲绳，小泽还叫第七舰队撤出日本呢。现在的民主党，早已忘记了当年的立场。2011年11月14日，冲绳县议会提出“反对边野古迁移意见书”，11月18日，他们派代表到东京，将“意见书”提交首相官邸及外务省，民主党在道义上已经失去民心。而且，在“回归”美国的同时，野田还公开批评鸠山“回归亚洲”和“东亚共同体”的“幻想”，强力推行增税政策，逼迫建党功臣的“小泽团队”离党。至此，民主党内部分裂走向衰败，2013年大选，他们失去政权，毫不意外，2013年7月，参院选举，民主党再次惨败，沦落为一个小野党。

民主党的迅速衰落，客观上为美国的“回归亚洲”扫除了一个障碍。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，“反美者必速亡”绝非个例。日本外务省前国际情报局长孙崎亨，最近写了一本书，披露在战后日本政治，从鸠山一郎、岸信介、田中角荣、到小泽一郎、鸠山由纪夫，历届首相和政治家，如何受到美国的制约和操控。其中，田中和小泽的垮台方式近似，金钱美女丑闻，比如田中因为“罗克希德事件”被判有罪，而事实则远非如此简单。田中企图在能源和外交上更加自立，并越过美国和中国合作，事后多年有证据表明，美国有关当局是制造事件的黑手，并利用事件将他的政治生命置于死地。¹⁴ 这个“购岛”故事，还有待全部历史真相的揭晓。总之，中日关系的背后，美国势力的阴影无处不在，渗透到政经媒体各界，还是那句老话，中日关系的本质是中美关系。而在日本，“反美者必速亡”可称一个定理。“购岛”之后，中国反应再次出乎日本政

¹⁴ 孙崎亨：《被美国打倒的政治家们》，（日）小学馆2012年。

府的预料，有日本战略家们指出，如果中国将毛泽东的“持久战”用之于东海，那将是日本的恶梦。

三、“结构性”变化中“帝国”还是“均势”

上述的种种，属于布罗代尔所谓“最富于人类趣味”也最为“肤浅”的事件，只是“历史表面的动荡、历史潮流负在背上的泡沫”，而理解历史的变革，必须扎进浪底；比起这些事件，更重要的是经济、社会、与政治的“结构性”变化。¹⁵毫无疑问，中国和亚洲复兴是一个“结构性”变化，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，它似乎偶然而逐渐地显现出来，从“东亚模式”到“中国道路”进入人们的视野，而“主流世界”的隆重对应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。

2011年11月，希拉里·克林顿在《外交政策》发表文章，题为〈美国的太平洋世纪〉，这是一篇美国“重返亚洲”的宣言。¹⁶她写道，“伊拉克战争结束，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。现在，美国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折点（pivot point）。这十多年，美国在那两个战场投入了巨大的资源。今后十年，我们有必要考虑如何精巧地（be smart）、有系统地使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。今后十年，美国必须保持和维护领导地位，确保国家利益，并取得将我们的价值观扩散到全世界的有力地位。比较具体的说，今后的十年，对美国国政来说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，在亚洲太平洋地区，在外交、经济、战略各个方面确实地增加投入”。

克林顿的表述，被解释为 pivot to Asia，即“重返亚洲”，美国政府前亚洲政策主任贝德则说，Pivot to Asia 不是“重返”，而是“再平衡”

¹⁵ 彼德·伯克：第二章〈布罗代尔时代〉，《法国史学革命，年鉴学派 1929~1989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，第 27~48 页。

¹⁶ Hillary Clinton: “America’s Pacific Century” (http://www.foreignpolicy.com/articles/2011/10/11/americas_pacific_century)。

(Rebalances),¹⁷ 日本将“再平衡”更具体地解释为“牵制中国”。从美国的角度看, 10 多年的“反恐”战争消耗巨大, 2010 年前防长盖茨就写文章说, 美国需要帮助同盟各国“自己保护自己”。¹⁸ 他的意思是说, 美国领导世界的负担太重, 今后要消减军费, 同盟国要增加军事投入。根据美国国防部 2013 年的发表, 十年之内美国要消减军费 4900 亿美元, 此前还看到要消减一万亿美金的说法, 即每年 1000 亿美元。近年来的美国军费开支, 2010 年为 7280 亿美元, 2011 年为 6980 亿美元, 2012 年为 6600 亿美元, 已经呈减少趋势。欧盟 27 国, 2012 年军费不过 2700 亿美元, 相比之下美国还是大头。2013 年 4 月 10 日, 日本新闻发表的数字说, 美国 2014 财年(2013 年 10 月~2014 年 9 月)的军费预算为 5266 亿美元, 比上一年度减少 1000 美元以上。¹⁹

总量支出减少之中, 自然要突出“重点”, 奥巴马强调, 在亚太这个最重要地区, 军费预算不会消减。从 2012 开始, 美国海军力量的 60% 已经东移, 增加了三倍, 至少有两艘航母在这个海域; 飞机 200~300 架, 部署在日本和韩国的基地; 此外, 美国还加强了在澳大利亚、新加坡、菲律宾的力量, 为美国战略“重返”提供“支撑点”, 形成亚太地区的军事布局。同时, 还有一个“巧实力”的问题。克林顿的所谓“精巧的”使用资源, 大约是指“巧实力”,²⁰ 即利用美国与盟国的“集体防卫”, 少花钱多办事, 或许可能还通过军火挣钱。表面上对付朝核问题, 实质上牵制中国。此外, 在外交和经济方面, 也“精巧地”强化领导权。野田内阁以来, 日本承诺执行美国的“重返”战略, 增加自卫队

¹⁷ 见《财经》杂志, 2012 年 11 月访谈。

¹⁸ Robert M. Gates: “Helping Others Defend themselves”, *Foreign Affairs*, 2010 年 5/6 月号。参阅黄晓京: 〈东亚共同体的挫折〉, 《香港传真》No. 2010~48。

¹⁹ http://www.jiji.com/jc/graphics?p=ve_int_america-anpo-kokubouyosan。

²⁰ 约瑟夫·奈 (Joseph S. Nye Jr) 的概念深入人心 (可以参阅约瑟夫·奈: 《权力大未来》, 王吉美译, 中信出版社, 2012 年)。

的机动的防卫资源，填补空白。日本财政状况不良，防卫预算也受到法律的限制，上述的承诺是有限度的，但是，假如日本成功“改宪”，将可能合法的强军，并扩大承诺的范围。这样，钓鱼岛的主权争端，可能会引发新一轮东亚的军备扩张，美国的军火生意必定红火，并对中国构成压力。

近 20 年来中国和东亚经济持续增长，形成了一个北美、欧洲、亚洲“三大轴心”的格局。亚洲占世界经济的比重，已超过 20%左右，在不远的将来比如 2045 年，可能增大到 45%左右，“回归”到 1820 年左右亚洲的世界地位。在世界经济史上，亚洲一直占据主要位置，欧美“主流世界”的时代不过 300 年，资本主义的“民族国家”，以近代科技和工业改造世界，到 20 世纪初，欧美两个地区比重大约占世界经济的 70%以上。二战之后，日本、东亚 NIES、中国相继起飞，形成经济中心的再度东移，经济世界三分天下。中国成为最大的制造业基地，美国和欧洲非制造业“新经济”主导，失业率居高不下，如何复兴制造业和增加就业成为他们的课题。1980 年代日本“挑战”美国，主要也是制造业，“日本制造”风靡全球，处于劣势的美国最终压迫日本“转轨”改革，这种情况正重演于中美之间。美国与亚太区的贸易额大约一万亿美元，中国就占了 5000 亿。克林顿说，21 世纪，大部分的历史将在亚洲书写，这一地区将出现这个星球上最具变革性的经济增长，亚洲的许多城市将变成全球商务和文化中心，这是美国战略重点“重返亚洲”的经济背景。

亚洲地区的人口，一直占世界人口的 60~70%，人口众多，贫困落后。最初的制造业，主要是使用廉价的劳动力，“中国工厂”（factory China）、“中国制造”（made in China），穷人为富人打工，而“中国市场”（Market China）的迅速形成，也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件。中国出口各种制造品，进口大量的物品和资源，石油、天然气、铁矿石以

及大豆，举凡所谓能源资源的大宗产品，日本说“暴饮暴食”经济。而且中国还进一步“走出去”，在“主流世界”的领地寻找资源、能源和粮食，到2012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60%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接近30%。2010年4月15日，奥巴马对澳大利亚电视台讲的那段著名的话，既是一种“真情”的流露，也是“主流”对中国的“恐惧”：“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、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，那么我们所有人都会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，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。所以中国领导人会理解，他们不得不做出决定去采取一个新的、更可持续的模式，使得他们在追求他们想要的经济增长的同时，能应对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挑战。”

中国学者邓英淘早就提出，“多数人的现代化”无法走西方“经典的”发展道路，资源能源条件不允许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，必须转变“发展方式”。²¹ 所谓“页岩气革命”，据说可以将“化石能源”的寿命提高400年，几千米地下，横向采掘，水压分裂，技术主要在美国手里，中国有巨大的埋藏量，但是水资源相对匮乏，能否工业化生产还是一个未知数。中国的近期的需求，或许可以兼收并蓄来满足，但长期的发展，则必须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方向，“大象吃草”。无论如何，中国“大象”到处找自己的生存必须，对“主流世界”来说不是好消息，遏制后者迟滞中国的发展的各种企图，注定不可避免。

何况，中国还是一个体制“异类”的国家。冷战终结之后，“姓社姓资”的“两极世界”多元化，“主流”各国以美国的“单边霸权”为重心而集结，其他“非主流”如失去重心的“碎片”而多元化。“碎片体系”符合主流的利益，四分五裂的中国曾经历过任人宰割的历史。在冷战那解体后的历史潮流中，中国没有“崩溃”，似乎反而上升为另外一个重力，

²¹ 邓英淘：《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》，（香港）大风出版社2012年；特别是与王小强的对话〈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〉及〈导论〉。

形成新的重组中心。因此，世界格局演变为“主流”“统一”势力和“非主流”“分裂”势力的并存：美国及“主流”国家，代表着“统一”势力，“中国特色”以及其他偏离“主流”的势力，则代表着“分裂”势力。“反恐战争”和“颜色革命”，显示着“主流”“统一”的力量。但是，“恐怖主义”远未消除，“颜色革命”造成社会动荡，历史实践告诉人们，资本主义不一定“终结”历史，西方主流“现代性”不一定“普世”。

近代之前，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文明国家。在世界各种“帝国”的战争中，与已经消失的其他东方帝国相比，远在东亚的中国一直处于边缘甚至“孤独”的境地。古典学者写到：“若是有了罗马与波斯的友好睦邻关系，就可以形成一个从大西洋直到印度河流域的开放和繁荣的社会，同时也能促进与印度次大陆乃至中国的系统有效的交流。但事实上，我们看到的是交战和分裂——在欧洲西北部出现了一个新的权力中心，于查理曼大帝时达到巅峰；一个是步履蹒跚的拜占庭帝国，孤零零地守在君士坦丁堡，另一个是由各种伊斯兰政权所控制的中东腹地。在好几个世纪里，波斯和印度成了伊斯兰帝国的前哨，它还与非洲和东南亚建立了联系。而中国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孤立状态”。²²从公元前二世纪，中国开始向西接触中亚、波斯、阿拉伯和西方世界，其历史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典籍之中，²³而且“丝绸之路”的东西方交流，主要是贸易和文化，而没有卷入“交战和分裂”。以后“西风东渐”，到19世纪之后中国被卷入西方“主流世界”的“交战和分裂”，所谓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西方列强从海上而来，继承罗马帝国、法兰西帝国的征服传统，近代“民族国家”开疆拓土，海外殖民，从中国周边的缅甸到东北。²⁴基

²² 詹姆斯·奥唐奈：第四章〈失去的机会〉，《新罗马帝国衰亡史》，中信出版社2013年，第228页。

²³ 维·维·巴尔托里德等：《中亚简史》，耿世民译，中华书局2005年，第4页。

²⁴ 安东尼·派格登：《西方帝国简史》，徐鹏博译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。

辛格著作《大外交》，从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出发，将“国际秩序”归结为两类，一是“帝国型”，一是“均势型”，欧洲选择“均势型”是历史上诸多“帝国型”统治幻灭之后；中国的“均势型”统治是 2000 年前的战国时代，那以后是中华帝国大一统。²⁵ 不过，欧洲“均势”到了亚洲是“帝国”；反之，“中华帝国”大一统却不是欧洲意义上的“帝国型”，战争频率不亚于欧洲，但争夺的是权位，是内战和外族入侵朝代更替，而不是国际化的扩张战争，故中国历经战乱，其“国家形式”一直自己的本土延续，历史的三大关键要素民族，文化和地域基本上保持了“连续性”。而且，中国与“非中国”的边界并不清楚，周边“夷狄”可以融入中华，所谓“华夷秩序”和“朝贡贸易”也不具“排他性”。

40 年前，毛泽东发出和美国恢复交往的信号，尼克松也发出信号：不能让这个大国继续“孤立”下去。他大概想不到，40 年之后美国要和这个共产党大国商量“共治天下”。2008 年伯格斯坦 (C. Fred Bergsten) 提出美中“G~2 共治” (G~2 approach) 的构想，以“操纵全球统治过程” (to steer the global governance process)，应对“国际经济的各种挑战”。²⁶ 作者不是历史学家，而是政府智囊型学者，他指出，美中之间存在的“国际化”的各种摩擦，知识产权、操纵汇率、权威主义政府、价值观差别等“非市场制度”的因素，阻碍中国成为“负责任的大国”；这些问题已经具有“全球性”，影响到 WTO、IMF 规范的执行；中国积累的巨额黑字，也影响到国际资本流动；传统施压的方法无效，只好和中国“共治天下”。至于中国“异类”问题，他解释说，G~2 体制的真正意义就在于“改变中国”，这是今后数十年的课题。作者的老师基辛格评论说，确实要将中美关系提到一个高水平；布热津斯基补充说，需要一个非正式的 G~2，与美欧、美日关系平行；世界银行的佐立克和

²⁵ 基辛格：《大外交》第一章，海南出版社 2001 年。

²⁶ C. Fred Bergsten: “A Partnership of Equals”, *Foreign Affairs*, July / August 2008。

林毅夫则指出，没有一个强势的 G~2，G~20 也会失望。²⁷ 如此这般，中国恐怕受宠若惊，不知如何是好，“孤立”独行惯了，听到的多是批评教育，骤然登堂入室，高居“主流世界”的庙堂之上，岂不诚惶诚恐，不知是世界“改变”中国，还是“中国世界”“改变”世界？

“G~2 共治”还是“帝国”的霸气思维，那是他们的历史习惯。多元的利益矛盾，如何只由一两个国家所能左右？“重返亚洲”将太平洋变为“新帝国”的“地中海”？况且，“实在界”充满骗局，没有概念那么美妙，谨慎的保持和“主流世界”的距离，恐怕是明智的选择。1980~1990 年代，“日本模式”也曾是一个“异类”：“产业政策”、“官民协调”的制度模式，抑制市场竞争，培植国家竞争力，甚至“日本收购美国”。美国“硬软巧”兼施，逼迫日本“市场化”改革，再次“改变日本”。克林顿当权时期，美国抛开汽车产业之类的“构造问题”，逼迫日本改革金融体制，和美国“全面接轨”，这是日本由盛转衰的关键。在经济关系上，中美之间似在“重复”历史：贸易摩擦、“中国制造”、巨额黑字、最大的债主，类似当年的日本。与“甘当老二”的日本不同，中国在许多经济和金融的关键领域，继续“固执自我”，尚未全面深化自由化改革，而且在政治上另搞一套，二者结合被称为“共产党执政”的“国家资本主义”。在“主流世界”那里，中国继续列入“被限制类”国家名单，军工高技术绝不出售。比如，日本有一个“安全贸易 16 条”，和一个“不可交易”的中国公司名单，由政府严格管理，并受日美同盟条约的制约。在某种意义上，“主流世界”对“异类”国家的排斥，还是“一神教”传统，除非你改变信仰。当年，撒切尔夫人得知戈尔巴乔夫信仰“上帝”，于是对里根说对苏联的“改变”有了信心。中国的上帝信仰尚为少数，“改变中国”自然难度极大，因此，这个“统

²⁷ 参阅外交政策协会官网：http://www.fpa.org/topics_info2414/topics_info_show.htm?doc_id=912530。

一”和“分裂”的构图还会延续下去。

于是，战争和冲突的另外一个图景进入视野。哈佛学者阿利森（Graham Allison）说，全球秩序今后的关键，是中国和美国能否避开“修昔底德陷阱”（Thucydies' strap）。修昔底德总结战争历史说，恐惧、荣誉和利益是人类行动的三大要素，公元前五世纪，雅典的实力增长，使斯巴达感到恐惧，而正是这个无故的恐惧，使这两个国家最终走向持续 27 年的战争。按此逻辑推而广之，一个新兴大国与既有霸权发生竞争时，双方都面临巨大危险。19 世纪末德国的兴起，挑战英国的地位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战争决定胜负。阿里森的结论是，为了维系和平，双方政府和社会必须调整各自的态度和行动。²⁸ 对此，约瑟夫·奈有不同观点，并提出“霸权过渡”（hegemonic transitions）的说法。他认为以“修昔底德陷阱”分析当前美中关系，不考虑时机和整体情况容易陷入误区；而且如果通过“修昔底德”的教训，对“霸权过渡”作仔细探究的话，那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；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，事实上德国在进入 20 世纪的时候，实力已超过英国；如今，中国并不会以类似的方式超越美国。他的结论是，今后中国可能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，但在军事和软实力，美国将维持至少数十年的优势。²⁹

换句话说，中国复兴所引起的变化，对美国而言尚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，谈不上是“结构性”变化，至多是“经济总量”结构的变化，美国“霸权”秩序难以超越。的确，目前中国所谓“崛起”，主要是 GDP 总量、贸易和投资的增加。比如中非贸易近 2000 亿美元，对非洲投资 450 亿美元，其中直接投资 200 亿美元，“主流”批评中国“新殖民主义”，实质上并没有那么严重。美国“重返亚洲”，施展其“硬实力”，“软实力”，以及从会计规则、美式教育、好莱坞电影、到美国主导 TPP

²⁸ 转引自：<http://www.ftchinese.com/story/001050755?full=y>。

²⁹ 参阅：<http://www.171english.cn/voa/zhongwen/2013/june/meizhongguanxi.html>。

的“巧实力”，无非是未雨绸缪，延长“霸权过渡”时间，或者阻止中国“争霸”。比如，TPP 原来是新加坡、文莱、智利、新西兰四国发起的一个经济合作协定，包括“零关税”等自贸协定（FTA）的内容，并不新鲜，但是，美国 2010 年加入谈判，情况大变，影响到东亚区域一体化，甚至 WTO 的运作。美国一边和欧盟谈自贸协定，一边推动亚太 TPP，2013 年 6 月伦敦 G~8 首脑会议，集体表态支持欧美 FTA 和亚太 TPP，意思大不一样：

欧盟和美国将一起制定标准，在投资、政府采购、非关税贸易壁垒、知识产权、环境与就业、竞争性政策、国有企业的发展等方面，提出更严格的贸易标准。这套标准，不仅包括过去的降低关税、取消非关税措施、服务业的市场准入、贸易投资的便利化，而且更加强调其他国家国内的竞争政策、产业政策等等是否符合美国标准。比如，虽然日本是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之一，但是当日本要参与美国 TPP 谈判的时候，美国就提出日本的农业、邮政、医疗保健制度等，都不符合美国的开放标准和制度规范。因此，日本要加入 TPP，就必须改革这些领域的国内相关政策……美国全球战略转向的本质，就是以美国的制度、规范、标准来打造国际经济新秩序、新规则、新格局，目的是为了了解决所谓的经济全球化“失控”和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“不公平竞争”，为美国重振高端制造、重振创新、重振出口的结构调整服务，以摆脱美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空心化、虚拟化和高碳化的调整困境。从推动 TPP 做起，美国试图把所谓高标准的 FTA 范本推向全球，最终完成用美国标准和规则来打造全球的标准和规则。因此，经济全球化，从前 20 年的开放，现在正在走向全球按照美国标准推动新一轮的市场化。³⁰

³⁰ 张燕生：〈TPP 是美国的 game〉，2013 年 7 月 2 日（http://finance.ifeng.com/a/20130702/10047590_0.shtml）。

随着日本的参加，TPP 成员国增加到 12 个，占世界 GDP 的比重从 29% 增加到 38%。一个背景是，欧美日“主流世界”不满意 WTO “多哈回合”谈判。2001 年“多哈”谈判开始，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立，一直没有达成妥协，处于停滞状态。另一个背景是，东亚地区 ASEAN+3 机制逐渐成型，中日韩自贸协定，向着立约方向进展（2013 年 3 月，中日韩开始 FTA 谈判），而且中日韩加印度等 16 个国家“地域综合经济合作”（RCEP）的谈判，2013 年 5 月已经开始，美国无法主导。美国主导 TPP 又是“一举两得”：一是夺取亚太经济合作“立法权”；二是将上中国一军。“中国除外（anything but China）”为美国的既定方针，后来又说 TPP 不排除中国。一旦中国参加，代价巨大；中国不参加，代价同样不小，有被边缘化的风险。作为“重返亚洲”战术之一，TPP 逼中国决策。部分“主流”学者主张借助外力，推动“更像美国”的改革，首先就是金融自由化，那样的话，很可能重复日本的“接轨”的失败。

实力即改变他人行动的力量。在政治经济军事博弈中，实力会影响“结构性”变化速度和方向。“东亚共同体”不符合美国利益，而“重返亚洲”发挥实力，并在战术上继承“老罗斯福”，中日“均势”，分而治之，事半功倍。最近，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提出一个报告，题为《2030 年中国军力与美日同盟》，他们认为今后 15~20 年最可能的潜在挑战，不是中、美、日三国之间拉开全面战争的帷幕，而是中方借助军力的增长，在和日本的领土争端过程中，有可能处于更加强势的地位（“霸权过渡”）。从军事角度来看，美日同盟在空中和水上的优势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日益减少。假如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出现问题，中国政府被迫将目光转向“维稳”，对于美日同盟来说，将使“中国威胁”指数降低。因此，他们提出了三个“选项”：一是，美日占据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制高点；二是，在保持至少一定程度上的战略制高点的同时，避免明显的

深度打击和“围堵”，力争保持某种平衡；三是，努力和中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一种互不侵犯的合作关系。基金会的詹姆斯·肖赫夫(James L. Schoff)就这份报告接受新闻采访时说，从政治上的可行性来讲，第一项和第三项难以实施，第二项恐怕更接近实际。按照这个逻辑，则自以为是的日本的政客，在钓鱼岛那里，为美国的战略家们，提供了求之不得的“均衡”点。不过，因为美国“新帝国”的亚洲存在，能否建立“均势型”格局尚未可知。

最近，习近平和奥巴马轻松会晤，日本政治家大为紧张：奥巴马别一时冲动，破坏平衡，出卖日本“国益”。“习奥会”的前一天，2013年6月6日，美国著名“知日派”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其(Richard Lee Armitag)，接受《产经新闻》采访并解释说，6月7日的“习奥会”，美国已经通知了日本政府，会晤结束之后，也会说明一切，美国绝不会再搞“越顶外交”(尼克松当年不和日本打招呼，而突访中国，被日本称为“尼克松冲击”)。阿米蒂其还说，“习奥会”可能会涉及钓鱼岛，周边海域已经有所缓和，岛屿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，日本采取不妥协又忍耐的态度，中国方面也开始理解云云。关于钓鱼岛主权，美国从来不表示立场，他只是说，如果日本受到侵略和威胁，美国不会站到中国的立场上去，至于动用美军武力，他说那要“看情况而定”。至于历史观，他认为安倍只是想提高日本国民的信念，是“中道”和负责任的，希望不会陷入偏狭的民族主义。³¹ 2012年10月23日，阿米蒂其率团会见李克强，面对李副总理关于保卫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“说教”，和对日本“购岛”破坏战后秩序的批判，他表达了美国不会站在中国一边的立场，据说还故意问了一个极端的问题：关于南沙、西沙的问题，我们如果采取和在尖阁一样(安保条约对象)的对应，那又怎么样呢？³²

³¹ <http://sankei.jp.msn.com/world/news/130607/amr13060722460013-n1.htm>。

³² 春原刚：《暗斗：尖阁国有化》。

根据美国的报道，2013年6月7日，习近平在和奥巴马会面时，并没有讲钓鱼岛为中国的“核心利益”。而日本的新闻则报道说，2013年6月13日，奥巴马和安倍通了30分钟电话，并说在中美首脑会谈时，习主席曾“固执地”谈到了钓鱼岛，奥巴马回应说，请理解，日本是美国的老朋友，不要在东海采取任何行动。对此，安倍表示感谢美国顾及日本的立场。其实，日本对此并不满意。在日本和美国的地位协定之中，钓鱼岛周边的“大正岛”和“久场岛”一直是美国军队的射击场和爆破场，这是一个明白的事实，美国为什么不承认日本的领土主权？一旦东海有事，美国真的会为日本打仗，还是另有选项？或者美国企图在亚洲建立欧洲式的“均势”，同时保持自己的帝国地位？不论如何，在“结构性”变化之中，美国的如意算盘能否实现，并不单取决于美国。

四、政治派系之争影响“搁置共识”

回过来再看看“结构性”变化中的日本。日本战后“民主改革”，美国“立宪”，在“国民统合”的“象征性”天皇制国体之下，实行“政党政治”。其政治文化的特色之一是“1955年体制”，即保守党派合并而成自民党，在多党之下长期“一党执政”体制。野党，如公明党、社会党、共产党则长期在野，他们反自民、反“日美安保”、维护和平宪法、体现民主，但类似“公知”。虽说战败大伤元气，明治以来底子雄厚，软硬设施坚固，人口素质高，在这个体制下和平发展、贸易立国、“高度成长”。其政治文化的另一个特色是“派阀政治”，自民党内派系众多，相互竞争也相互合作。比如，田中角荣及其派系当权，“冒险”完成“日中关系正常化”，其派系旧部如鸠山~小泽，尔后竟一直是中日交往的主要力量。1990年代，自民党分裂，田中派的小泽~鸠山等另立门户，最终组建了民主党，目标是美国式的“两大政党”体制，结局如上所述。

另一方面，与战后第一代吉田茂、池田勇人等政治家相比较，年轻一代的日本政治家日益“职业化”，政客色彩浓厚，“二世三世”的子承父业者居多。近 20 年来，连日本人也说不清换了多少首相，组了多少党，反正谁当首相都一样，他们的政策制定能力日益衰落，只好依赖职业官僚制定和推行政策。

近年来在中国暴得大名的石原慎太郎、野田佳彦、安倍晋三属不同的政治派系。石原“对美国说不”，轻蔑中韩，主张“日本价值”，实际上是所谓“市民社会”的“个人至上主义”的代表，既非北一辉、大川周明、石原莞尔一流的右翼“国家主义”，也非“保守主流”。³³野田本非宰相之器，“草根”遇上好运气，自称“泥鳅”而成内阁总理，无疑是民主党内各派系协调的结果。从自民党、社会党等分离而成的民主党，和自民党一样派系林立，小泽派、鸠山派、前原派、野田派等等，不过他们尽力避免以往“派阀政治”的色彩，以示“反自民”的初衷。野田本人是千叶县船桥市人，笔者曾长期在该市居住，经常见到他在地铁站前演讲，风雨无阻。有时候他不演讲，站在滚梯那里发一张纸的政治纲领，嘴里不断说着：“早上好，早上好”，理睬者不多。笔者匆忙之中倒是不忘客气，接了他不少的“街头劝诱”的小纸条，虽然作为外国人而全无选举权，其“草根”政治如此。

安倍是政治世家的公子。外祖父岸信介，从“满洲国”高官、东条英机内阁阁僚、A 级战犯开除公职，到“1955 年体制”第一代自民党干事长、总理大臣（1957~1961 年），主持“新日美安保条约”的签订，动用右翼和黑道镇压“反安保运动”，被称为“昭和的妖怪”，一贯反

³³ 金一南著作《苦难辉煌》中写到：“石原莞尔的画像，书籍和疯狂的想法，一定在其子石原慎太郎家中保存完好”。这是一个错误。石原慎太郎，1932 年 9 月 30 日出生于神户，其父是海运会社山下汽船的石原洁，1951 年去世。母亲光子。与出生于山形的石原莞尔毫无关系。战时，石原莞尔反对东条英机扩大战争，战后主张“亚洲联盟”，石原慎太郎则轻蔑亚洲，思想系统也完全不同。

共，而且非主流学者找到证据说，岸信介是 CIA。父亲安倍晋太郎，当过外务大臣，为自民党“主流派”之一“岸信介~福田纠夫~安倍派”的领袖，以后被森喜郎~小泉纯一郎~安倍晋三所继承。³⁴ 老安倍于 1991 年病故，否则可能在竹下登之后继任首相。“福田派”和“田中派”不和，当年演出过一场“角福战争”，该派一贯的政策基调是亲美、改宪、自主防卫，小安倍的基本政治观念渊源在此。副总理麻生太郎，也出身名门，吉田茂的外孙，铃木善信前首相的女婿，和安倍家比较接近。小安倍是真正的自民党传人，离开政界的老牌政治家“中国通”加藤紘一说他是“得天独厚”。

“田中派”起源于吉田茂、佐藤荣作（岸信介的亲兄弟），公开团体称为“木曜会”及后来的“木曜俱乐部”，再以后竹下登的“经世会”，是自民党的主流派系，势力强大，有“钢铁般的团结”之称。田中角荣当政之后，经过竹下登~小渊惠三~桥本龙太郎三位首相，一直到现在自民党的津岛~额贺派，曾经称雄日本政界，与池田勇人~大平正芳一派为“兄弟派系”。正是所谓“大（平）角（荣）联合”，完成“日中邦交正常化”。1980 年代后期，田中卷入“罗克希德事件”被起诉，竹下自立门户，组建“经世会”，田中气恼而重病，其政治势力逐渐式微。小泽一郎由田中培养出来，后来分裂自民党，³⁵ 他的性格和做事风格，似

³⁴ 这个派系战后起源于岸信介。自民党派阀政治的习惯，以派系领导人的命名，岸信介引退之后，长期被称做福田派，公开身份是“清和政策研究会”。福田纠夫为大藏官僚出生，辞官后跟随岸信介进入政界。经济上主张均衡财政，反对田中角荣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高度成长路线；外交上亲美，一直是所谓“鹰派”，反对田中急于和中国恢复邦交。他的政治路线为同派出来的首相森喜郎、小泉纯一郎、安倍晋三所继承。不过，1978 年邓小平访问日本，与福田赳夫签订“中日友好条约”。其子福田康夫也作过首相，但政治思想却于自己的父亲有区别。

³⁵ 当时的“田中派”大约拥有 140 名国会议员，被称为“田中军团”。二阶堂进、金丸信、竹下登为主要干部、中坚人物是所谓“竹下派七奉行”的羽田孜、桥本龙太郎、小渊惠三、小沢一郎、梶山静六、奥田敬和、渡部恒三，其他还有绵贯民辅、野中广务。小沢和田中

过于强势而专断，不受一般日本人欢迎，终成孤家寡人。最近来中国访问的野中广务，也属“田中派”，资历和小泽相当，证言“搁置共识”，他见到刘云山常委，回到日本对新闻界说，我就是为了说这番话才去中国的，不会收回有关言论。“搁置争议”是田中说过的，我在自民党的研究会上也亲耳听到。政府的官房长官极为被动，只好说他已经是一介平民，不加评论云云。

如此不同的路线和人物，汇聚在一个党内，不得不说是政党政治的一个奇迹，日本政治的文化特色。在各个派系的“政策竞争”中，对美和对中关系，一直处于重要位置。关系到国家外交，按理说派系之争当在第二位以下，毕竟国家利益和名誉是第一位的，但是，派系之争无疑会影响外交政策，而且一旦和官僚的刻意屏蔽信息相结合，确实可以造成严重后果。比如关于钓鱼岛“搁置争议”这件事，现在的日本政府和主流学者，异口同声反驳说，从来没有这个共识。而实际上，知道有这个“君子协定”的人很多，1972年随田中访华的官房长官二阶堂进、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、条约课长栗山尚一、以及国际情报局长孙崎享等，都以不同方式、在不同场合证明了这段故事。但是，日本政界已非“田中派”强势政权时代，物非人非，况且在日本社会，离任之人的证言和学者的研究，都不是官方记录。政治家如安倍晋三，利用官僚的信息屏蔽，多次重复日本政府从没承诺“搁置争议”，甚至指责中国说谎。那么，外务省没有“官方”记录？读了矢吹晋教授整理并引证的历史记录（中日双语），除了对日本政府和“主流”学者的无赖大感无奈之外，似可发现派系之争的影子。³⁶

早夭的儿子同年出生，被田中特别照顾。“七奉行”前三位皆当过日本首相，后来羽田、小沢、奥田、渡部四人离开自民党，建立现在民主党。

³⁶ 矢吹晋：〈尖阁问题の交渉経緯の真相〉，2012年9月25日（<http://chikyuzo.net/n/archives/26306>）。

矢吹晋总结说，第一，在外务省公布的田中角荣~周恩来第三次会谈（1972年9月27日午后4:10）的日语记录中，田中说：“尖阁诸岛的事情怎么考虑？我那里说这说那的人很多。周恩来说：现在谈钓鱼岛的问题不好。出石油了变成了问题。如果没有石油，台湾和美国也不会当一个问题”。³⁷ 就这么一点记录。第二，第四次会谈（1972年9月28日午后3:00）谈完台湾问题，周恩来说：到这里终于算谈完了。田中说：“不，还有尖阁诸岛的问题没完”。周恩来说：“你提这个问题，双方都有好多话要说，首脑会谈就没完了吧。所以，这次不谈这个问题”。田中说：“唔，说的也是。那么，这个事找别的机会再说”。至今，代表政府立场的一些著名论客，在公开讨论时，常常不讲田中的回应，只讲周恩来的话，硬说这是中国单方面的立场。

第三，1978年8月10日，邓小平和园田直外相会谈，根据张香山的记录。³⁸ 邓小平说：“我们两国并不是不存在一些问题。比如你们说的尖阁列岛，我们叫钓鱼台问题，还有大陆架问题。但在你们国内，不是有一些人企图挑起这样的事情来妨碍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吗？我们中国人也不是没有这种人，比如说，我们留美的，加入美国籍的，有些还是华侨，不是有一个保钓吗？在台湾也有“保钓”呢！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，本着“和平友好条约”的精神，放几年不要紧，很可能这样的问题，几十年也达不成协议。达不成，我们就不友好了吗？要把钓鱼台问题放在一边，慢慢来，从容考虑。我们两国之间是有问题的。我们两国政治体制不同，处境不同，不可能任何问题上都是同样语言。但是我们间共同点很多，凡事都可以“求大同，存小异”。我们要更多的寻求共同点，寻求相互合作，相互帮助，相互配合的途径。条约的性

³⁷ 石井明、朱建荣、添谷芳秀、林晓光编：《记录和考证：日中国交正常化》，（日）岩波书店2003年。矢吹文章的很多内容引证此书，不再注释。

³⁸ 张香山著：《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》，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。

质就是规定了这方向，正是你说的一个新的起点”。园田说：“你谈了这个问题，我作为日本外相，也不能不说一点。如果不说，回去就不好交代。关于日本对尖阁的立场，阁下是知道的，希望不再发生那样的偶然事情（张注：指中国捕鱼船队，一度进入钓鱼岛海域），我讲这么一句”。邓小平说：“把这样的事情摆开，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找到办法，我们的下一代，再下一代总会找到办法解决的”。园田不失为老政治家，并表示敬佩邓小平的政治家气度。可是，在外务省的官方记录当中，这些涉及钓鱼岛的谈话不是被删除就是被篡改。矢吹晋主张，必须原样恢复外务省记录，告诉日本人“搁置共识”的真相。

第四，2010年发生中国船长被捕事件，在众议院会议上，民主党议员神风英男说，搁置没有达成共识是政府立场。但是，大平内阁时代，当时的冲绳开发厅派调查团去尖阁诸岛，中国方面抗议，说违反和邓小平副总理达成的共识。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，当时的园田直外务大臣说过，考虑日本国益，在这里引起问题才符合国益吗？我自己一直不动声色，听着邓小平副主席的讲话，20年、30年保持现状，即使从日本独自的国益出发，不是应当感谢的吗？这位议员提到的园田证词，实质上是说“搁置争议”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，从各种记录来看，当时的大平首相也是同样的立场。³⁹

周恩来~田中，邓小平~大平~园田那样的政治家，不用字斟句琢，相互理解对方的意思：以大局为重，不必斤斤计较。那个时代确是一个大局的共识存在。但是时过境迁，其他派系比如“福田~安倍派”的政治家和官僚，不喜欢这种风格，政府立场一贯是“不存在领土问题”，“搁置争议”等于承认存在争议的客观事实。最近出版的日本记者的追踪调查，早在1973年，即田中~周恩来历史性的会谈之后，那位在美国

³⁹ 矢吹晋：〈尖阁问题の交渉経緯の真相〉，2012年9月25日。会谈的书面记录被故意简略，或者将有关内容删除，或者做另外的解释，那时官僚的强项。

宣布“购岛”的石原慎太郎，已经和现在“地权人”栗原国起家族接触过，栗原的母亲拒绝了年轻的石原议员对钓鱼岛的企图。⁴⁰ 也是在1973年“福田派”的石原议员，参与组织自民党跨派别的“青岚会”（31名年轻议员参加），反对田中角荣和中国关系正常化，反对和台湾“中华民国”断交。小安倍对当年他的所属派系与“田中派”的争斗，可能有着历史的记忆。至于其身边的官僚，只要无文字记录和签字的协议，就是不存在，安倍身边不少这样的专家。同样“田中派”的“搁置共识”，一直传承到鸠山，他退出政界之后，言论自由，以前总理的身份不断地说日中之间有“搁置共识”，于是成了“国贼”。“田中派”的政治人物，相当多的卷入某种金钱和女人的丑闻而败落，而“福田派”人物却很少，这只是偶然的孤立事件，抑或是有某种外来势力的介入，至今依旧是一个谜。

无论如何，1970~1980年代中日关系的“黄金时代”已成过去。那个时代的政治家，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“战中、战后派”，80多岁的石原属于“战后派”那一代，至今依旧大骂美国，纠结于战败的羞辱，但是与和田中、大平不属于一个谱系。野田、安倍一辈政客，大多是“冷战派”，接受的是正统的美国教育，里根~中曾根，布什~小泉的示范，很难像老一辈从中国古典《楚辞》中找“共识”（田中讲话用“迷惑”一词道歉，周恩来听了不快，毛泽东送田中线装《楚辞》，后世推测其中有“迷惑”的古典用法）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美国、西方和日本为先进国家，平等的“主流”伙伴，社会主义只是笑话，中国和前苏联一样，终将走向崩溃。这个基本的“主流”世界观，加上政治派系的深刻记忆，使现在的日本政治家难以理解中国的深刻变化。

⁴⁰ 春原刚：《暗斗：尖阁国有化》。

五、美国“主流”影响日本思维

貌似“草根”政治家的野田，出身于著名的“松下政经塾”第一期。1979年，“企业经营之神”松下幸之助，拿出自己的70亿日元的私人财产，创办“松下政经塾”，旨在培养新一代具有“国际视野”的政治经济领袖。在野田的阁僚当中，从“松下政经塾”出来的人物不少，比如，玄叶光一郎外相（第八期）、长浜博行官房副长官（第二期）、松原仁副国土交通相（第二期）、三谷光男财务省政务官（第四期）、神风英男防卫省政务官（第七期）、民主党前原诚司政调会长（第八期）、樽床伸二干事长代理（第三期）等等，所以他的内阁也被称为“松下政经塾内阁”，那么他们的“国际视野”是什么呢？

这些少壮派政治家，1990年代开始参与日本改革，参与组建“日本新党”，目标是建立“美国式的两党体制”。不过，他们大学毕业后就进“松下政经塾”，接受精英教育，企业经验和行政经验皆无，大多属于“职业政客”。故当权之后，经验特别是外交经验不足，只得依赖一班职业官僚。一位经济界人物，就对笔者说起他所熟悉的野田首相，其性格“愚直”，不通外交，在“购岛”事件上，是听了外务官僚的建议。从笔者自己读到的文献来看，野田和前原诚司等人对日美关系似乎早有研究。2008年11月，他们一起参与过关于“下一代的日美关系”的研究计划，报告书题为《考验日美同盟之时》。他们认为，排除美国的“东亚共同体”是一个“危险的幻想”，而这正是同党的鸠山首相的基本政策。野田上台之后，在*Voice*杂志发表论文说，现在没有必要打出“东亚共同体”那样的愿景，鸠山构想太多“理想主义”。关于日美同盟，那份报告的基调是，和美国一起强化所谓“离岛防卫”，应对可能发生的领海军事冲突；强化“相互防卫”，对关岛的防卫作出贡献；修订日美安保条约，将来签署“西太平洋相互防卫条约”；改变对“集体防卫”

的解释，并主张为海外“长久派兵”立法。在日美关系问题上，作为自民党的对手的民主党内阁，反而和自民党一样，特别是和“第一次安倍内阁”一样，只不过没有打出“改宪”的口号而已。

美国“主流”思想界，特别是共和党保守派，和日本有深刻的渊源和影响力。2012年8月15日，正当围绕竹岛和钓鱼岛问题，中日韩三国“混战”的时候，“第三次阿米蒂其报告”发表，阿米蒂其和约瑟夫·奈二人领衔。从2000年开始，他们总是选择政权交替之时，发表一个对美日关系、东亚问题的战略性、“超党派”的政策研究报告。2000年，第一次“阿米蒂其报告”，正式名称：“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: 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”，催促日本为“亚洲有事”立法；2007年，第二次报告，正式名称：“The U.S.-Japan Alliance: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”，呼吁日本效法美英关系，将美日同盟“全球化”；第三次，也就是这次发表的报告，题目是：“The U.S.-Japan Alliance: 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”，用了“锚定”一词，强调美日同盟“铁”的程度。观其内容，无非配合美国的“重返亚洲”，催促日本在军事上、立法上作出迅速变革，以对应中国的“重新崛起”（re-rise of China）及其“不确定性”。⁴¹

报告说，美国无疑站定了“一流国家”（tier-one nation）位置，从经济实力、军事实力、全球愿景、国际事务的领导力，都是如此。日本是否要成为“一流国家”，还是沦落为一个“二流国家”，则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。如果日本不想做一个“一流国家”，甘于“二流国家”的地位，这个报告没有意义。作者们说，日本具有作为“一流国家”的实力。如何（继续）成为一个“一流国家”？美国老师分析了日本的众多问题，诸如日本

⁴¹ 该报告的英文原文，可参阅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官网（http://csis.org/files/publication/120810_Armitage_USJapanAlliance_Web.pdf#search='The+U.S.Japan+Alliance%EF%BC%9AAnchoring+Stability+in+Asia%EF%BC%8C'）。

的人口老化、低出生率、核电问题、能源需求等等，提出解决途径，比如参加 TPP。他们还分析了日本周边态势，特别是中国的复兴，及其“国家核心利益”的扩张，提出了美日同盟的“新安全战略”。依照他们的观点，欧洲在今后至少 30 年之内不会发生战争，而亚洲则不然，无法否定这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。这个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队、核武力，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是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地区，美国无疑会被卷入。因此，美日同盟关系，比起任何时候都重要，世界第三的经济大国，拥有军事实力的“民主国家”日本，一直是美国“重返亚洲”战略实施的关键。

“第三次阿米蒂其报告”首先针对 2009 年的“鸠山构想”，即“美日中等距离”和“东亚共同体”。阿米蒂其说过，鸠山是一个“唱高调而不负责任的梦想家”，他们是“现实主义者”，其思想符合美国和日本的利益。现实是什么，日本学者解读说，首先东海及日本海附近，埋藏着尚未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，其总量可能超过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沙特，美国（和日本）要确保这个资源。另一方面，美国的机会可能正好来自冲突，战争的情景如下：一旦发生冲突，美军必将支持日本而参战，中国军队将会对美日在日本的基地实施打击，从而开始新的“中日战争”。随着战争的展开，美军将逐步撤出，战争将以中日两军为中心展开。战争激化之时，美国可能参与和平谈判，并由美军出面充当“维和部队”。在报告的“新安全战略”部分，针对中国海军试图超越日本列岛、菲律宾“第一岛链”的努力，报告的作者们主张美日实施“反介入区域拒止”，以美军的“海空战”和日本自卫队的“动态防卫力”相结合来对抗，其前提是自卫队必须“合法”地参与军事行动，行使“集体防卫”。这意味着日本必须“改宪”。

日本防卫研究所在“中国安全保障报告 2011”⁴²中也分析了中国

⁴² 原文可参阅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官网：http://www.nids.go.jp/publication/chinareport/pdf/china_report_JP_web_A01.pdf#search。

军力的成长、海洋战略的方向性、海洋政策、海军动态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警戒和焦虑。这个军事机构的报告，显然是和强化日美同盟，支持美国“重返亚洲”的战略相配合，并增加一个对于日本能源安全的担忧。2011年的地震、海啸和福岛核电站事故，使日本面临一次“新的能源危机”，中东地区一直是日本能源的主要供应国，而那个地区的混乱和中国的参与，使得日本对中国的动向更加敏感，对于东海项目“天外天”，日本也不断地表示不满。防卫研究所这个报告，代表着“穿制服”的军方立场，而以能源安全的面貌出现。

在与美国“主流”和中国的不断博弈之中，民主党失去了政权。当年，因为说不清楚的疾病而放弃政权的安倍（“第一次安倍内阁”：2006年9月26日~2007年8月27日）再次登场，他顺利地当选为自民党总裁，并成为日本首相。他“改宪强军”的基本政治思想，笔者早在“日本改宪”的文章中分析过，⁴³人们注意到，他再任自民党总裁之后立即称赞石原“购岛”之举，当政之后便立即重新拿起“改宪强军”的旗帜，辅之以“价值观外交”和“安倍经济学”（Abe Economics），政治思想顽固不变。在钓鱼岛问题上，他坚持“固有领土”，“无领土纠纷”，以及“无搁置共识”，并历访东南亚、印度、蒙古那样的“民主国家”，摆明了和中国在“价值观”上的差异。所有这些基调，都是美国的“主流”思维，而且这一次学生超过老师走上台前。

六、“思想的中国”与现实的中国的落差

自古以来，日本不断地移植中国文化，中国是所谓东洋史的源头。这个话题在日本一直上溯到“汉委倭奴国”、“卑弥呼”（himiko）、

⁴³ 黄晓京：第二章〈日本改宪及其战略目的〉，《方法的日本——超越资本主义与亚洲的文化革命》，（香港）大风出版社2011年。

“遣隋唐使”和鉴真东渡等等。尽管对唐宋之后的“科举制”和“华夷秩序”，日本曾保持距离，但事实上不论经济还是文化，日本曾经是“中国世界”的一部分。近代西方文明兴起，日本追随强者，“脱亚入欧”，“谢绝东方恶友”（福泽谕吉），以此为近代日本“民族国家”的立国思想，而“兴亚论”和“大亚洲主义”沦为非主流。日本思想界一直围绕这个“西方”还是“中国”，“主流”和“非主流”的是非不断上演纠结、对立和思想的格斗。最近日本和中国、韩国之间，关于历史观、战争责任、岛屿主权、慰安妇等问题，再次引发思想界的论战。中国的复兴，尤其是不同于“主流”的“道路”实践，被日本“主流”认定为“中华思想”复归或“华夷秩序”重现。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，美国和中国的任何“接近”行为，都使日本“主流”大受刺激。可以理解的是，美国和中国不管是对抗还是合作，日本总是夹在中间，一旦发生战略误判，难免“两边不是人”。日本无法绝对信任“美日同盟”，狐疑之下自然在“同盟”的招牌之下加入“改宪强军”的自选动作，一个矛盾的统一体。

日本战后民主，“一亿人总中产”，形成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结构。言论自由，各种主义和思想同时存在，反省和肯定“日本近代”相互对立，在“宪政民主”外衣之下，继续“天皇制”和“派阀”政治的民粹，还有矛盾的“中国观”。笔者当年曾试图找一篇文章，综述“日本的中国研究”，访遍书肆而不可得，方才醒悟：没有，也不可能。有。“日本的中国研究”包罗万象，甚至就是日本自身的研究，无法综述。最近，政治学者中西辉正评论说，近十年来，日本人的“中国观”发生了“激变”。不知道后世的历史学家，如何评论这个“激变”……日本的自尊植根于“世界第二经济大国”，如今，这个地位被中国所代替。而且，日本的“中国观”一度似乎有了“结论感”，即随着经济的发达，中国将逐步走上日本所走过的道路，现在则需要反思，这个“结论感”过于单纯。中国依旧是一个“世界上没有经验过的异类”，或许只能说，日中

之间存在“深刻的文明冲突”。⁴⁴的确，日本很难“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”，因为他们有一个“思想的中国”，而那个“思想的中国”和“现实的中国”有着巨大的落差。如果需要总结一下日本的“中国观”，以政财学界为主的下述诸端，或可为其要者，不过，最多是一种“中国关系观”，历史的总结还有待于将来。

前大使丹羽有他自己的“中国观”，或可谓经济界“中国关系观”的代表人物，他在任期间号称要跑遍中国各省区，广交朋友，并且常带上日本企业的首脑人物。他的“中国观”清楚明白，“日中是没法搬家的邻居”，“大中华圈”时代一定会到来，日本可以做“大中华圈”的“属国”。对石原“购岛”他公开批评说，此举毁掉了40年的中日友好关系，被罢了官被骂为卖国贼，此翁安之若素。他和不少“财界”领袖一样，理解中国复兴的意义，对于他们而言，“东亚共同体”或者“中国世界”不是口号。美国欧洲和日本自己走入衰退，日本企业界融入中国市场，依赖中国需求，中国在一些诸如精密仪器和先端材料方面，也依赖日本企业的供应。1.7万家在中国的日企，1000余万日企员工，加上与其相关的日本国内经济，范围涉及几乎所有产业领域，在日本股市有所谓“中国关系股”，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可想而知。中日交恶不仅损害双边利益，而且波及其他国家和地区，比如巴西的电器厂家，因为得不到中国制造的日本品牌零部件的及时供应而深受影响。

2012年秋发生日本“购岛”事件，中国100个城市抗议游行，中国的日企大约损失数百亿日元，加上抵制日货，取消赴日旅游，进出口货物通关停滞，以及难以获得中国的工作签证，损失更大。汽车业最具代表性，日产汽车的中国销售占世界市场大约15%，2012年9月之后销售直线下降，丰田、本田遇到同样的窘境，开工率降到50%。大游行之后，日本企业每天收集中国各地公司和子公司情况，供东京本公司参

⁴⁴ 中西辉正：《作为帝国的中国：霸权的理论和现实》，（日）东洋经济新报社2013年新版。

考，在无奈之中，只得修正原来的中国扩张计划。在过去的中日交往历史上，经济先行推动外交和政治，从“LT 贸易”（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）到“友好商社”民间外交。自民党长期政权，依赖经济界的支持，财界具有较强的话语权，现在，一切皆成历史。1975 年以来，连续 37 年定期访华的“日中经济协会”代表团（丰田汽车董事长张富士夫为团长）被迫取消访问。2012 年 9 月 27 日，贾庆林政协主席会见“日中友好七团体”，经团连会长米仓弘昌表示，希望中日之间尽快找到“出路”，避免双方更大的损失。10 月 9 日，米仓对新闻界说，经济界很困惑。非常遗憾的是，日本方面的行动引起的如此情况。此翁对安倍的经济政策也曾公开批评，媒体称他是“暴走财界老人”（石原是“暴走政治老人”）。此后，日元大幅贬值 40%，股价大幅上扬，受到经济界普遍欢迎，米仓不得改变立场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他几次访华，充分了解中国的立场，似乎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，或者说“财界”对政治的影响力今非昔比。

经济界重视中国，来自对世界“结构性”变化的认识。2012 年 4 月 16 日，经团连智库“21 世纪政策研究所”发表了一个“全球化日本 2050 年模拟和综合战略”的报告，报告指出，日本“失去 20 年”，GDP 停留在 20 年前的水平，同时政府债务高达 GDP 的 200%，长期性问题如能源供给、人口减少，对经济发生全局性影响，长此以往日本将失去发达国家地位。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，报告对 2050 年世界 50 个国家的经济和日本的地位，根据生产率和劳动人口的变化，做了一个模拟推演，提出“四个图景”，基本内容是人口减少，劳动人口减少，投资减少的可能结果，简要概括如下：第一图景，生产效率从失去的 20 年的恢复，但是由于人口减少，投资减少，从 2030 年起进入负增长，2050 年 GDP 为世界第四位，排在中、美、印度之后，人均 GDP 被韩国所超越；第二图景，生产效率依旧低下，2020 年代进入负增长，GDP 世界第五位，人均 GDP 世界 21 位；第三图景，在财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，2010

年代开始负增长，GDP 世界第九位，人均 GDP 28 位，完全失去经济强国地位；第四图景，女性劳动参与增加，和瑞典并列，第一图景发生改变，GDP 2.8% 增加，但世界第四位的情况不变。如果新兴国家在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止步不前，欧洲危机更加严重，那么日本的情况会更加恶化。同时报告认为，日本有着绝好的机遇，地处 21 世纪的全球发展中心亚太地区的中间位置，克服危机的机遇就在眼前，“中国世纪”或“亚洲世纪”的到来。2050 年中国“近乎发达国家”，日本如何和中国合作是一个关键。⁴⁵

和上述“财界”的立场形成对照的是所谓代表“底层社会”的日本社会主义各政党。“后发的”的资本主义，有着和经典欧洲“主流”微妙的不同，日本“马（克思）派”和“社会主义”思想高度发达，其早期影响中国共产党，战后制约“主流”的日本保守主义。初了日本社会党（与民主党重组合并）之外，独立至今是日本共产党。该党 1912 年建党，有知名的野坂参三、德田球一等人参与，和中共一样也是“共产国际”的支部。昭和时代“宪政专制”，日共遭镇压，一部分转向合法的社会民主党。1931 年 9.18 以后日共坚持“反战”、反“帝国主义日本”、反“绝对主义天皇制”、反“地主所有制”、反“垄断资本主义”，并确定通过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段阶革命论”。1933 年，官本显志被捕，开始长期的狱中斗争，野坂参三亡命海外，在延安从事革命活动。1945 年以后，日共合法化，1946 年获得五个国会议员席位，1949 年获得 35 个席位。1950 年，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和占领军冲突，麦克阿瑟下令开除日共国会议员，禁止政治活动，德田、野坂只好亡命中国。朝鲜战争之后，武装斗争路线得不到支持，日共陷入混乱。1955 年之后，日共放弃暴力革命，官本掌握领导权，执行独立自主的路线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中国批判日共“修正主义”，其党内

⁴⁵ http://www.keidanren.or.jp/journal/times/2012/0426_04.html。

分为两派，一派批“苏联修正主义”，另一派批“中国左派教条主义”。1970年代之后，主要是议会斗争，1972年一度成为第二大在野党，与社会党一起和自民党对峙。

1989年，宫本显志说，党已经放弃“社会主义革命”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民主改革。苏联解体之后，他表示欢迎“霸权主义的、历史性的巨恶之党的终结”，说苏联东欧“脱离社会主义”。冷战之后，日共及工会逐渐弱化，“小选举区”制度的改革，“两大政党制”的出现，日共的议席减少，1996年只有两席。2000年之后，在不破哲三、志位和夫的领导之下，采取更加现实的路线，在议会选举中苦斗，在走马灯式的“组党”“解党”之中光荣孤立，反对增税，为底层大众说话。2011年地震之后，日共参与救灾，在地方议会得到更多的席位。2012年选举，日共反对参加“TPP”得到“农协”的支援。现在党员大约31万人，二万多个支部。到2013年1月为止日共的国会势力，众议院八名议员，参议院六名议员，而地方议会议员达到2760人，东京都的议会选举，日共成了第二大党。日共的“党是”是“科学社会主义”，反对“从属美国”和大企业支配，主张“民主革命”和“将来的社会主义变革”。在发达国家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，日本共产党的规模最大，不依附“主流”，关注底层群体利益，得到日本社会的一定尊重。其“中国观”是承认中国“指向社会主义”，但是尚处于建造社会主义基础的时期，因为中国的人均所得还只是发达国家的八分之一，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合理的，同时由于选择了这条发展国内外资本主义的道路，造成现在的腐败和社会不公、环境破坏也是必然。中国的将来取决于和贫困与收入差距的斗争，以及如何解决政治民主化问题，错误和失败不可避免，而像苏联那样偏离社会主义是最大的危险。⁴⁶

⁴⁶ 2013年11月12~13日，日本共产党第九回中央委员会总会决议案（参见以下文章：http://www.jcp.or.jp/akahata/aik13/2013-11-15/2013111504_01_0.html）。

日本自古效法中国，但是没有接受科举制，与他们历史上欧洲式的封建等级制度不合。明治之后，“废藩置县”，贵族和封建藩阀被现代文官（武官）制度代替，才有“韦伯式国家”的普遍官僚制，和中国历史反向而行，东条之类为武官官僚的典型。战后日本的职业官僚，不直接参与政治，“政官分离”，除非他们辞官而投入政治活动，当选国会议员，才可涉足政治。大多数官僚，一生的职业目标是担任局长和事务次官，大臣和政务次官与他们无缘，只能由国会议员即政治家担任。政治家是“流水的兵”，一旦政局变化立即下台换届；官僚是“铁打的营盘”。财务省（原大藏省）、经产省（原通产省）、外务省是官界重地，其次是法务、农林水产、国土交通。1982年，美国社会学者詹森出版《通产省和日本奇迹》，⁴⁷将战后日本的“经济奇迹”，归结于“开发型国家”（Developmental State）的体制因素，重点之一是“通产官僚”主导的“产业政策”。正当美日贸易摩擦激烈之时，此书流行一时，代表着“日本异类”或者“日本修正（资本）主义”（revisionism）的学术倾向，并影响到美国和中国。城山三郎的纪实小说《通产官僚的夏天》，以实在的人物佐桥滋（典型的官僚人物，他进入通产省历任秘书课长、重工业局次长、重工业局长、企业局长、特许厅长官、事务次官）为原型，描写了“高度成长”时代，官僚与政治家、财界领袖之间的博弈。其中的经典话语是，“国家的经济政策，不能受政财界的想法和利益的左右”；对年轻官僚的教导是：“你们是国家雇佣的，不是大臣雇佣的”。这部“官僚治国”经典，1996年、2009年两次被拍成电视连续剧，应该说是“怀旧片”。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，日本推进“市场化”和“接轨”的改革，“脱官僚”的口号和“脱亚入欧”一样出名，政治家主导加上经济界“国际化”和IT技术进步，官僚对于经济的指导力今非昔比，不

⁴⁷ Chalmers Johnson (1931~2010) : *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: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, 1925~1975*.

过在外交上，不论是中日关系正常化还是现在的钓鱼岛危机，都可见到官僚的身影，因为政治家太多外行。

政财官界之外是日本学术界，他们的“中国观”极为多样。以历史哲学为“经”，以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为“纬”，加上永远存在的“左翼”和“右翼”，除了大学讲坛，也参与一些政府的咨询机构，如各种审议会、研究会以及媒体讨论。近年来，中国研究的热度，可以和美国研究并列，各色学界人物出书不断，重点是中国和东亚的历史，中国的政治经济，除了日本人的研究之外，也关注中国的研究动态。日本的政客，嘴上也说“理念的政治”，实践上是“职业的政治”，选举和利益是第一位的，与想要“理解中国”的学者有距离。反之，学者一般与政界人物也保持距离，最多是以专长承担顾问角色。历史上，思想界和日本政治，联系更紧密一些，比如“日本阳明学”，曾影响过一批明治维新志士，吉田松阴、高杉晋作、西乡隆盛、河井继之助、佐久间象山皆为阳明学者。有个问题至今没有解释清楚：日本阳明学经世致用，中国阳明学流于空论，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。战后，阳明学者安冈正笃教育了一代自民党领袖，被称为“自民党之父”。⁴⁸ 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少见。在政治家身边少不了学者，比如小泉启用竹中平藏，鸠山背后有寺岛实郎，安倍身边有浜田宏一，⁴⁹ 他们主要是某个领域的专家，而不再是思想家。

⁴⁸ 安冈正笃(1898~1983)，阳明学者。阳明学被认为是“帝王之学”，其内容则主要是所谓“阳明心学”，讲求知行合一。安冈曾是北一辉、大川周明所组织的“犹存社”成员，曾与山本五十六、蒋介石交往。战争期间曾任“大东亚省”顾问。败战后，他创设的各团体和学校，被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解散，财产没收，安冈自身被开除公职。信奉安冈并师事之的政治家，包括吉田茂、池田勇人、佐藤荣作、福田赳夫、大平正芳等自民党领袖，皆当过日本首相。

⁴⁹ 浜田宏一，1936年生，经济学者，专攻国际金融论、博弈论。东京大学名誉教授、耶鲁大学名誉教授。东京大学硕士毕业后，留学美国，师事耶鲁大学的詹姆士·托宾（James Tobin，198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）。历任日本经济学会会长、法学经济学会会长。他认为“失去的十年”主要是金融政策的失策，力主金融改革。2012年12月就任安倍内阁官房参与，被认为是安倍最重要的智囊。

日本的中国学界,除了一般经济问题,比较有代表性的“问题意识”是中华传统的中心~周边秩序到底是什么?它是否继续存在并反映到内政外交之中,还是变成了“近代主权(民族)国家系统”?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“连续性”和“断裂性”如何认识?对此也是众说纷纭。比如,毛里和子(早稻田大学教授)认为,尽管第一个问题非常难以回答,在毛泽东时代的国际主义之中,是渗透着传统的世界秩序观;但毛的时代和现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,虽然看起来有断裂;中国的外交有一个多层次的结构,既有“现实主义”、建构主义,又重实力也讲究艺术;对美外交更多“现实主义”,对日外交至今为止则更具东方“道德”(moralism)色彩等等。⁵⁰从这种有代表有性的“问题意识”出发,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者,似乎更强调中国的“特殊性”,中国社会变化的长期性,比如沟口雄三的历史研究,进一步寻找《方法的中国》,探究中国独特的“普世性”,也包含对“西方近代”及日本“近代”的反省。这个问题意识由来已久,当年石原莞尔在远东裁判出庭作证,除了说东条没思想,我多少有点儿思想,还说了一句,该把佩里(1853年7月8日,“黑船来袭”时的美国舰队司令,逼迫日本开国)从那个世界叫回来出庭,日本都是和美国欧洲学的。

成立并坚持了60年的“亚洲政经学会”,不论是历史学者(古代、近代、外交史、经济史)还是政治经济学者,多是各个领域的代表,他们不一定是中国问题专家,但在自己的研究中多涉“中国观”。在其历届的理事长名单中,可以看到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许多研究者,比如,板垣與一(一桥大学1964~1968年)、石川滋(一桥大学1976~1978年)、卫藤沈吉(东京大学1978~1981,1983~1985年)、冈部达味(东京都立大学1987~1989年)、山田辰雄(庆应大学1991~1993年)、渡边利

⁵⁰ 毛里和子:〈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备忘录〉,可参考:<http://www.law.osaka-u.ac.jp/c-forum/symposium/0702mohri-2.htm>。

夫（东京工业大学 1993~1995 年）、中兼和津次（东京大学 1995~1997 年）、小岛朋之（庆应大学 1997~1999 年）、天兕慧（青山学院大学 1999~2001 年）、国分良成（庆应大学 2005~2007 年）、加藤弘之（青山学院大学 2007~2009 年）等等。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不同，也有左右之别，以笔者的接触而言大都是比较认真的学者。其中，学会编辑的《现代中国研究丛书》和《亚洲研究》杂志，广泛涉及中国、印度、东南亚、伊斯兰世界等众多的“地域研究”课题。⁵¹ 一般来说，他们各有自己的专业，也各有自己的一个地域，并精通那个地域的语言文化。相反，1996 年成立的那个“新历史教科书作成会”，集合一帮子投机文人，少有真学者，却要推翻“近代侵略史观”，“东京裁判史观”，还要“重写历史”。安倍曾在国会上说“关于侵略，学界也没有清楚的定义”。此言一出，包括美国在内的学界一片哗然，他不得不改口，不再提修改“村山讲话”。似乎和他外祖父一样，临死之前还在念叨，是“进出”中国还是“侵略”，客观上是侵略吧。

媒体的“中国观”更是五花八门，也有比较明确的左右之别。可以说，如果一个读者，长期阅读《朝日新闻》（偏左），世界是一个样子；长期阅读《产经新闻》（偏右），世界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；电视等媒体也类似，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。近年来，媒体中“中国观”值得注意，有客观的报道，也少不了偏见。中国政治和经济最受关注，什么“中国九”“中国七”（常委人数）“中国进入非洲”，还有环境污染、空气污染、水污染、食品安全、假货……。“购岛事件”之后，领土问题成为焦点，反日游行被广泛的报道，包括那些过激行为，他们称之为“暴行”。各大主要媒体，都有其民意调查机构，抽样之后，电话调查，很快发布。政府自己也介入民意调查，全国抽样数千人，有调查员入户访问。比如，2012 年 10 月，日本内阁府外交舆论调查，日本民众对美国有亲

⁵¹ <http://www.jaas.or.jp/>。

近感的 84.5%，认为美日关系良好的 79.3%，皆比 2011 年的调查呈上升趋势；相反，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只有 18%，比 2011 年的 26.3% 大幅下降，无亲近感的从 2011 年的 71.4% 上升到 80.6%。认为日中两国关系良好的，18.8% 下降到 4.8%，认为关系不好的则从 76.3% 上升到 92.8%。这些数字，看似一般，却常常被政客利用。⁵²

《朝日新闻》在 2012 年 8~9 月间，也实施了一个调查。对“目前中日关系保持良好状态吗”的提问，90% 的日本人和 83% 的中国人说“不”，而 2002 年的调查对相同问题，日本人 41% 和中国人 22% 说“不”，普通民众相互之间感觉不良。不过，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，日本 49% 的受访者认为“应该深化两国关系”，40% 回答“应该保持距离”；而中国分别是 42% 和 53%。对“中日两国面临的最大问题”的五个选项中，中日两国民众都认为“领土问题”和“历史认识问题”是两国间的最大问题，而对“是否认为应该尽快解决钓鱼岛问题”的提问，日本有 72% 的受访者选择“应该尽快解决”，24% 认为“不用急于解决”。⁵³

其实，日本的一般民众，没有十分清晰的“中国观”，就像没有什么固定的宗教观一样。他们在正月初一（元旦，日本在明治时代 1878 年之后，不在使用中国的阴历）参拜“神社”，孩子出生也到神社“除厄”；结婚用基督教仪式，目地在于时尚；死后则用佛教仪式。老一代日本人，对中国的兴趣相对较大，读的中国古典也多，孔孟名言，唐诗宋词，随口而出；年青人对中国的事情知之甚少，吃喝玩乐为主，对中日美过去的战争少有知识。害人的民族容易忘却，而被害的民族很难忘却，也包括了年轻一代的政治家。

日本社会基本特征之一是“纵式社会”，这是社会学家对其社会构造的一个研究结论，即日本社会从“封建藩阀”，到现代“公司社会”，

⁵² <http://www8.cao.go.jp/survey/h24/h24-gaiko/2-1.html>。

⁵³ <http://world.people.com.cn/n/2012/0924/c1002-19091532.html>。

纵向关系强于横向关系，命令~服从系统强于民主。而现实社会如此多元化，与所谓“纵式社会”似乎相互矛盾，其实不然。在现代化的多元社会背后，日本传统的因素依然存在，并且巧妙地和“现代性”结合一体。因此，自上而下的观念，远远强于一般社会的横向互动。政财界处于“纵式社会”的顶端，他们的意见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。现在日本“中国观”的混乱，主要是政财界顶层的观念相互矛盾：政治是“世界主流”思想，而经济却是“回归亚洲”。同时，权威与多元的矛盾也会发生影响，使这个国家的“精神”世界处于“分裂”状态。此外，日本存在一个“思想的中国”，即他们的“中国观”的历史沉积，与“现实的中国”存在极大的落差。其中既有传统的中国，又有“主流思想”的中国认识。汉学家的中国研究，很难进入一般日本人的个人空间，而“主流”中国观则通过媒体迅速传播，从今年来日本的政治思想风潮来看，西方“主流”加日本“思想的中国”占据了主导地位，这个情况也可从“小安倍”政权的执政理念中看到。

七、安倍政权的“别无选择”

“小安倍”政权的政策走向，无疑是“主流思想”加民粹的产物。本质上，他要背靠美国的“主流世界”在亚洲当老大，不能让经济界过度亲中，更不想让中国当老大。如上所述，他有极为深刻的自民党“岸信介~福田~老安倍~小泉”的家族的或者派系历史的传承，以及与“主流世界”的历史渊源。第一次安倍内阁（2006年9月26日~2007年9月26日，包含一次改造内阁），基本上是对小泉“构造改革”的继承，并加入了“脱离战后体制”的口号，指向“改宪强军”。第二次安倍内阁，不论是“价值观外交”还是“三支箭”的经济政策，安倍在“主流思想”之上又涂抹一层国家主义的颜色。他祖父搞的日本安保条约，使

日本变成一个“非普通”国家，或者“不完全主权”国家，他知道过分的依赖日美同盟，无法应付“中国威胁”的挑战。根据这个基本判断，安倍内阁的政策主要是，以美日同盟为主轴，自己“改宪强军”，推行“价值观外交”，同时振兴日本经济。实际上，他的“主流”或“右倾”政治观，带有较强烈的传统保守主义色彩。至于经济政策，则受到他外祖父时代“管制经济”和美国“主流”学者的两方面的影响，这是一个奇妙的政策组合，可以说是“国家主义”和“自由主义”的混合物。同时，安倍的“中国观”是旧时代的遗物，他把中国当作“威胁”和对手，而不是口头上承认的“战略合作伙伴”。可以说安倍的内政外交，除了“皇室继承”问题之外，都和中国有关。

直接指向中国的是“价值观外交”（Value Oriented Diplomacy）。2006年“第一次安倍内阁”时期，安倍首相和麻生外相，就提出这个外交方针：与日本具有同样的尊重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法制、市场经济等“普世价值”（Universal Values）的国家强化合作。其基本含义是，联合“民主国家”，牵制、抗衡、围堵“异类”中国。2007年，安倍访问印度，在国会演说中提出，建立日本、印度、美国、澳大利亚的“自由与繁荣之弧”（这个词原来是麻生著书的书名），四国合作的基础是分享自由民主的“普世价值”。而“自由与繁荣之弧”所指的地区，不单只是这四个国家，还包括从北欧、巴尔干各国、中东欧、中亚、中东、印度、东南亚，一直到东北亚的广大地区。2007年，日本外务省出版蓝皮书，强调重点支援波罗的海、东欧、高加索、中东、中亚、南亚及东南亚等地区的“民主化”，并且向“民主化”的台湾示好。这显然是一个极为过时的思想，也许因为找不到别的“说法”，只好祭起这面美国老师用旧了的旗帜，以期“出师有名”；或者反过来，作给美国老师看，以掩盖真实的目的。

安倍当政之后的初访（2013年1月16~18日）选择了越南、泰国、

印尼。后来又访问了蒙古。每到一处，他都大谈“民主国家”的“共同价值观”。麻生初访选择缅甸，自称具有象征性意义。2012年12月26日，安倍在捷克的报业联盟（Project Syndicate）杂志发表文章，题为〈亚洲民主安全的钻石〉，⁵⁴他指出，南海将沦为“北京之湖”（Lake Beijing）了，和前苏联将鄂霍次克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海一样。他将南海的“中国扩张”，和日本在“东海不屈服”的“牵制”结合起来，以示其对华关系的战略正当性。2013年1月，安倍访问印尼，提出一个“东盟外交政策的方针”，即以日美同盟为基础，与ASEAN各国合作普及自由、民主、人权等“普世价值”，海洋要靠法治管理，促进贸易与投资以实现共同繁荣，共同保护亚洲的多种文化传统等“五项原则”。除了麻生的著作和思想，安倍的“价值观外交”，还得到前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等智囊的支持，目标是在“亚洲新兴国家”实现“民主化”。据说谷内智囊正被派往北京，不知道是谈“没有搁置共识”，还是教育中国人什么是“普世价值”和“民主化”。

安倍的经济政策，仿效“里根经济学”，被命名为“安倍经济学”（Abenomics），他自己说这是“三支箭”。日本人知道战国“大名”毛利元，用“三支箭”教训三个儿子“团结就是力量”，其起源大约是成吉思汗母亲的“三支箭”教导。第一支是“大胆的金融政策”。2012年11月15日，在当选首相之前，安倍自民党总裁宣布，为了摆脱长期的通缩，他的政府将采取“无限制”的量化宽松政策。从那时开始，日本长期低迷的股市和日元连动，很快形成股票高涨、日元贬值的局面，被称为“安倍市场”、“安倍泡沫”。11月~2013年2月，股市连续上升12个星期，接近1958年12月~1959年4月连续17周上升的“岩户景气”的最高记录。3月8日，日经平均股市价格回到“雷曼危机”前的水准；

⁵⁴ Shinzo Abe: “Asia’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” (<http://www.project-syndicate.org/commentary/a-strategic-alliance-for-japan-and-india-by-shinzo-abe>)。

3月26日，东京上市企业的时价总额，达到362万亿日元，与野田解散议会时相比，增加了111万亿日元。

第二支是“机动的财政政策”。政府提出总计十年、200万亿日元（大约二万亿美元）的计划，首先是50万亿日元“大型补正预算案”，以刺激经济，主要用于老化的基础设施改造。2013年2月7日，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，民主党前原诚司质疑安倍的“第二支箭”说，通缩的背景之一是日本的人口减少，巨大的财政赤字之下，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，不仅继续增加国民负担，能有什么效果？对此，安倍回答说，“人口减少和通缩没有必然关系。通缩是一种货币现象，只有通过金融政策才能改变。人口减少的国家很多，不一定陷入通缩”。不过，日本的村镇，上千人户家，一年去世40~50人，新生儿1~2人出生，前原的质疑来自这个实际。

第三支是“刺激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”。2013年1月7日，日本的三大经济团体，即经团连、经济同友会、日本商工会议所，召开新年祝贺会，政界、官厅、财界1700人出席，极为盛大。安倍晋三首相出席并讲话说，“三支箭”其实是一支箭，“以成长创造富裕”；政府会认真倾听在世界竞争中的产业界呼声；抑制日元升值，是企业竞争创造环境；此外，政府计划设立“产业竞争力会议”，主要讨论成长述评战略的具体化；健康养老产业、绿色能源等领域，具有战略性，政府会进一步减少规制，促进民间投资。经济界代表回应说，为了成长战略，企业也要负担风险，2013年可以说是“经济再生元年”，官民之间要携手合作。同时提出，“三支箭”的经济政策，需要很好的平衡才能发挥效益，要求政府尽快解决“财政重建”和“少子高龄化”问题。

大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，是“安倍经济学”的受益者。日本的财政年度是3月31日决算，安倍选择的时机绝佳。2013年4月，三菱东京UFJ银行、瑞穗银行、三井住友银行，这三大银行2013年3月决算的税后利益，合计超过二万亿日元，为最近七年以来的最高水准。日元

贬值快速，2013年5月10日，四年多来第一次回到一美元兑100日元的水平，五个月内贬值大约20%。2013年5月15日，日经平均股票价格达到1.5万日元，超过万亿日元的企业，增加94家，恢复到2007年末（107家）的水准。5月19日，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上市企业，发表2013年3月的决算数字，70%的企业，共943家的营业利润超过预期。丰田汽车董事长奥田硕说，从一美元兑90日元到100日元，是一个合适的汇率，汽车和电机的出口增加，贸易赤字消失。日本汽车协会的丰田章男会长则说，“失去的20年”之间、日本企业的时价总额减少了360万亿日元，用“安倍经济学”大概拿回来大约一半。

“安倍经济学”的出台，并非一时冲动，美国老师早就指点过。1998年，诺奖得主克鲁格曼教授指出，日本可能陷入“流动性陷阱”。⁵⁵要使日本经济回到正常轨道，需要采取大量的“印钞票”（Print lots of money）的手段，刺激民间需求。安倍政策一出台，克鲁格曼立即表示赞扬：过去三年，各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，都受到一种“通说”的束缚，增加就业的提案，总是以后果严重为理由而被否决。理由就是一旦增加支出，会受到债券市场的惩罚，而增印货币将导致通胀。因为什么也不能做，所以什么也不要做。打破这个“通说”的，没想到竟然是日本。⁵⁶他还说，不论安倍是不是真的关心经济，对问题有无深入思考，政策是对的。另一个诺奖得主约瑟夫·斯蒂格利茨（Joseph E. Stiglitz）在2003年关于日本经济的文章中则指出，通货发行权不单在中央银行，还在政府。为走出衰退，日本政府可以通过“印钞票”去填补财政赤字。个人和企业有了钱，可以增加消费；银行可以增加对企业的贷款以刺激经济。政府发行的纸币可以叫做政府纸币。在流动性陷阱和零利率的情况下，纸

⁵⁵ Paul Krugman: “Japan’s Trap”, The Official Web Page: <http://web.mit.edu/krugman/www/japtrap.html>。

⁵⁶ 日本《文艺春秋》杂志社编：《安倍经济学的大论争》一书，2013年3月号。

币和国债本质上是一样的。一旦通胀发生，抑制通胀的成本很高，在经济学上没有被证明，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过是一个神话。⁵⁷

十年之后，安倍政府似乎采用了他们主张。2013年3月，斯蒂格利茨和安倍见面，他评价说，日元贬值，刺激景气，摆脱通缩的政策是正确的。同时他也指出，现在的世界，除了欧元危机那样的短期问题之外，还存在着地球温暖化、贫富差别扩大等长期性问题。在成长战略中，对医疗和教育等长期课题应该增加预算。日本新自由主义代表学者、小泉改革的主要推手竹中平藏也说，安倍经济学“100%正确”，并被安倍任命为政府的“产业竞争力会议”主要成员。亚洲开发银行（ADB）黑田东彦前总裁也说，日本经济的最大课题就是摆脱通缩。15年连续一贯的通缩异常过分，不但对日本经济是负面的，对世界经济也是负面的。现在的改变，对日本经济是正确的，对世界经济也是正确的。他现在是在日本的央行总裁。

野田佳彦前首相在2013年4月7日的一次演讲中痛批安倍，他说和海外投资家聚餐，有人说“ABE”（既是“安倍”的日语发音也是“安倍经济学”的三字英文开头字母）是这样的：A是Asset（资产），B是Bubble（泡沫），E是Economy（经济），“安倍经济”就是“资产泡沫经济”。企业统治协会理事八幡和郎的批评更直率，政府的做法是干起来再说，和“偷袭珍珠港”一样，违反世界常识，不就是赌博嘛。不过，除了德国政府，美国和欧洲不少国家的政府和国际组织，普遍对“安倍经济学”持支持态度。英国《经济学家》杂志最搞笑，在封面上把安倍描绘成了一个“超人”形象，还在底下写明“安倍经济学：民族主义和

⁵⁷ “How can Japan's deflation be reversed? Assume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financed its deficit partly by printing money rather than borrowing.” (Joseph E. Stiglitz: “Lessons from Japan's Economic Malaise”, <http://www.project-syndicate.org/commentary/lessons-from-japan-s-economic-malaise>)。

挑战中国”。从“价值观外交”来看，安倍的确如此，挑战或牵制中国，与他的经济政策有着微妙的关联。和中国经济几乎“捆绑”在一起的韩国，反映强烈，因为日元贬值可能影响韩国产品的出口。2013年2月19日，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议上，韩国代表批评日本政府“诱导日元贬值”；韩国《中央日报》甚至说，日元贬值是“沉默的杀人者”；中国最初也有相似的反应，比如1月22日，新华社评论说，安倍经济学是一个“以邻为壑”政策，有可能引起通货战争；百度上搜索“安倍经济学”一词，可以找到数不清的众多评论，比如，安倍的“三支箭”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，日元贬值会不会影响中国的贸易，这个政策是不是日本的一个阴谋等等。

总体来看，日元汇率的变化，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，相对减弱了。换言之，中国已经从 **Factory China**、**Made in China** 向 **Market China** 转变。出口速度降低，不只是一个汇率因素的影响。2007年以来，日元一直在升值，并突破了80日元兑一美元，中国的贸易顺差从2007年的二万亿，下降到2011年的1.4万亿元，中国外需和日元币值的升降相关性不大。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国，对中国出口占到日本GDP的2.8%，超过对美国的2.2%；而日本制造业的最终产品，很多已经是 **Made in China** 和 **Market China**，日元贬值，有失有得。亚洲金融危机的1998年6~7月期间，日元曾贬到146日元兑一美元，那时的中国还是 **Factory China**，沿海为主，出口导向，故影响相对较大。当时的美国坐视不管，并要求中国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。这次，情况不同了，中国对这个“周边有事”的日元，具备了较强的应对实力。

日本股市的“牛市”气氛，则主要是投机的产物。日本投资证券界的业内人士说，半年来，日本股市上涨接近50%，而主要的投资人不是日本人，也不是日本国内的“机关投资人”，而是国际投机资本。2012年10月~2013年6月，大约9.2万亿日元的外资流入日本股市。日本的

成长与否，与他们关系不大。对国际投机资本来说，只不过时机正好。2012年秋天以来，他们对日本的股票“持有量不足”（underweight），安倍政策给他们提供了机会，开始增持到“中性”（neutral）。现在，不少“对冲基金”之类，说不定又要离开日本股市。至今为止，日本机构投资者尚未出手；个人投资股市可能会增加，因为500万日元以下的交易免税制度的出台。如果日本的法人和个人出来投资股市，股票还会上涨。业内人士评论说，So far so good，用另外一个词来说，就是“来时容易去时难”：投机赌博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关键还在于是否能推动实体经济的扩张。日本的量化宽松，效法2008年之后的美国，而在美国开始反省是否做过了头，日本又开始了，其后果大概是不同“震级”的问题，难以预测。⁵⁸

面对过去的20年，日本0.9%的低成长，“安倍经济学”是摆脱困境的一个试验。因为是试验，可以是“头痛医头”，日元升值过度，诱导贬值，刺激出口；“脚痛医脚”，2%的通胀目标，国内油价上涨，考虑给卡车运输公司优惠政策。日本经济的关键还在“第三支箭”，即所谓“成长战略”的实施，这取决于日本国内的实体经济，新增投资，而这一点最值得怀疑。因为，日本国内的潜在需求最多1~1.5%，扩大国内投资，制造和销售产品，几乎不可想象。企业考虑的是中国、印度、印尼等亚洲地区的发展。亚洲有40亿人口，10%就是四亿，超过日本市场的三倍。对于这一点，学界和产业界早有共识。对日本国内经济来说，和德国情况相似，人口减少，需求减弱，但德国近几年的增长率在3%以上。区别在于如何提高附加价值，增加高端技术开发和产品，单纯以来日元贬值带动出口，不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。

中国和亚洲是日本“制造业资本主义”的活路所在，尤其是中国。在日本产业界，谁也不否定“民主”印度的巨大潜在市场，但毕竟还是

⁵⁸ 榊原英资等金融界人士对谈：〈安倍经济学的市场〉，《文艺春秋》2013年7月号。

“潜在”的，远不如“不民主”的中国那么“现实”。日本股市上涨的主要是“中国关系股”。在这个格局下，非要“China plus One”，即不要过分依赖中国，从米仓“财界总理”的“困惑”二字中可知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日本驻华大使馆最近整理了一个资料，分析日本和中国经济的“密切化”程度及其全球影响。日本依赖中国市场，特别是在最终消费品领域，如汽车和家电等产业皆在中国设厂，中国制造行销全球，而日本的材料和零部件必不可少，某些日中间产品，还要供给其他国家和地区，中国处在价值链的中间地位。这样一种制造业“全球化”格局，决定了中日经济并非仅仅是双边关系。

日本的“三支箭”，可能影响到中国周边的金融环境。汇丰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·金恩指出：“从以往的经验来看，日本实施于本土的货币刺激，往往造成全球范围的溢出影响，造成金融市场泡沫的膨胀和破灭。1997~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，以及2007~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，都是突出的例子。这两段时间里，都出现了日本银行贷款的大幅增加，以及热钱流入其他国家，并推高各国资产价格、扩大经常项目逆差，造成严重的资本错配。因此，对于货币战的指控不应仅仅局限于贸易层面，由货币及财政刺激带来的国内金融稳定问题更值得忧虑。这样一来，对于那些可能受套利交易影响的国家来说，出于对本国金融系统保护的考虑，实施更严格的资本及外汇管制也是顺理成章的”。金恩还评论说：“安倍经济学”的结果可能有四种：一是以失败告终，二是造成英国式的家庭收入下降，三是名义增长实现加速，四是通胀严重恶化。汇丰经济学家认为，第一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最大。⁵⁹

笔者推断，如果是第三种结果，即“安倍经济学”的表面效果持续一段时间，安倍可能继小泉之后，相对长期执政。过去三年，民主党“外行”内阁，大失人心，如今四分五裂，大势已去。2012年的众议院选举，

⁵⁹ http://news.gtsh.com/news/20130401/lengzhabiangang_833237902.html.

自民党获得多数席位，2013年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，自民党大胜，民主党一败涂地，一举改变众参两院的“扭曲”状态，强化了自民党的执政基础。这样中国必须考虑如何与安倍政府打交道。在强化了自己的政权之后，安倍外交可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，降低“价值观外交”的调门，转向务实。比如“购岛”决策，毕竟是民主党政权的遗产，为了某种政绩和缓和财界的压力，不排除他寻求与中国高层对话、寻求妥协的可能。除了上述第三种可能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安倍的身体。日本首相的工作是“重体力劳动”，据称他一直在接受治疗，如果痼疾重发，再演几年前辞职的一幕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
面对全球性的“日本忧虑”和批评，安倍内阁成员表现强硬。2012年12月28日，麻生太郎上任财务大臣，在会见记者时他说，三年前的G~20会议上，各国约定不搞通货贬值竞争。那以后日元对美元、欧元大幅度升值，谁遵守约定了，日本遵守了。美元、欧元贬值的时候，日本一句话没说，现在，对日本说三道四不大合适吧。在另外一个场合，安倍智囊浜田宏一说，日本的金融政策，是为了日本，不是为了巴西和别的国家……巴西那样不满的国家，自己应该采取对自己合适的金融政策。所谓“巴西那样的”，应该包括韩国和中国。

“价值观外交”和“安倍经济学”，再次表现出日本这个国家的本质矛盾：“东方的西方”。在欧美“主流”世界“圈子”里，“追随”、抱怨、委屈；对亚非拉美的“落后”或“途上”国家，和欧美“主流”一样，颐指气使，甚至以亚洲“民主国家”的“老大”自居。而在经济特别是产业领域，日本依赖亚洲这个成长地区，特别是“非主流”的中国。这个基本矛盾，决定了“回归亚洲”的日本企业的“困惑”，也决定了这个矛盾的政策体系无法长久。“价值观外交”，意识形态至上，拾美国“老大”之余唾，呼应者甚少。“主流思想”和秩序，是一段过去的历史，未必能代表“多元化”的未来；“安倍经济学”则为日本老化的

国情所限，前景不佳。7月初，日本内阁府官员到香港参加会议说，现在安倍首相的口头禅是“TINA”（There Is No Alternative 别无选择）。这是当年撒切尔夫人爱说的话，福山将它上升为“历史终结”的思想；撒切尔夫人还有一句名言说，“社会是不存在的”，即我们不是生活在相互独立的“社会”里，而是生活在同一个“世界”里。⁶⁰ 安倍也许确实“TINA”，这个世界不一定“TINA”。中国的“异类”道路和亚洲的复兴，或者正在指出“另外一个世界”。大前研一说的对，这个国家的政治家，不是谈论国家百年大计的“人种”。⁶¹

八、结语：“亚洲有事”与“中国道路” ——“历史是永远没有终结的终结”

“亚洲有事”是1990年代中后期日本人提出的一个说法，最初是指“台海危机”、亚洲金融危机，以后是指亚洲“新威胁”，指“北朝鲜核问题”和中国“扩张”。实际上，亚洲确实一直“有事”：冷战苏联解体，亚洲和中国复兴，“主流世界”嘴上说是“机遇”，心里暗藏“恐惧”，思想顽固不变。以日本政府“购买钓鱼岛”为象征，使中国周边环境恶化，也对“中国道路”和“和平发展”构成挑战。美国“主流”主导世界秩序，影响到西亚、南亚、北非和广大的伊斯兰社会，徘徊挣扎在“民主”和“动乱”之间，“亚洲有事”暗藏着打乱中国“非主流”道路的企图。

历史上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，因国力和文化的盛衰而相互制约、相互作用，中国强则周边是“中国世界”，中国弱则周边叛离，甚至“入主中国”。作为一个大陆农耕国家，传统威胁来自北部西北部草原游牧

⁶⁰ 玛丽·伊万丝：《现代世界的诞生——社会简史》前言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。

⁶¹ 大前研一：〈日本应该成为有“品质国家”〉，《文艺春秋》2013年6月号。

地带，对海上贸易索求不多；西方的文明侵略从海上而来，“海权”凌驾“陆权”，至今美日同盟的“第一岛链”，企图构成一个针对中国的“反向的海上长城”。麦金德曾预测说，中国占据着大陆和海洋的地缘优势，总有一天建立“既非纯粹东方的，也不是全盘西化的新文明”。⁶²现在这个“新文明”似乎已经初现端倪，世界经济“重回东方”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，并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。“主流”世界既想要中国机遇，又企图将中国收纳于自己的规矩之下。面对这样的格局，通过上述分析，或可得出几个简单的结论如下：

第一，来自“主流世界”的“两只手”制造“亚洲有事”，牵制、遏制、迟滞中国的发展，并间接影响“中国道路”的实践。这两只手，一只手是美国，“重返亚洲”平衡中国；另一只手是日本。日本出手有“双重动机”：一方面继续“追随”美国，为其“重返亚洲”战略提供支撑和均衡点，另一方面则借机实现“改宪强军”的目标，改美国战后给它立的“和平宪法”，集团自卫，自主强军，恢复“普通国家”地位。美国的那只手，“看不见的”和“看的见的”在两边下注：钓鱼岛主权问题，美国不持立场；发生东海军事冲突，美日安保条约的对象之内。中日海岛主权僵局，相互牵制或者对抗，符合美国的战略需求，也是老罗斯福东亚战略的延续或复活。

从闹着“购岛”的石原慎太郎，“买单”的野田，再到安倍的“价值观外交”，党派不同，行为方式相似，皆被“世界主流”所左右，而与现实的中国和亚洲复兴分途，毁坏了中日合作的政治基础。中间只有一个鸠山，他是“书生型”“梦想”主义政治家，崇尚“苏格拉底”的“无知之知”，对现存的“世界秩序”有所怀疑，主张从“东亚共同体”探索“另外一个世界”，在现在美国支配之下的日本，其政治注定短命。中国和亚洲复兴的指向，的确尚属“无知”的领域，谁也没有确定无疑

⁶² 罗伯特·卡普兰：《即将来到的地缘战争》第11章，广东出版集团2013年。

的自信。日本的“主流”政客抓住“不确定”风险，“回归”绝对“经验”自信的主流：至今为止，依附美国就是成功，今后也必定如此，一切既定，无须探索，政治家“职业化”的短视，使牵制中国顺理成章。大前研一说，街谈巷议的“安倍经济学”、TPP、通胀目标，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来说皆无关紧要。从长期趋向来看，“金砖”各国是“数量国家”，日本与这样的国家竞争，毫无胜算。从长期的历史来看，日本唯有成为“品质国家”，像瑞士、新加坡、芬兰、瑞典、丹麦那样。⁶³

日本“东方的西方”“主流”的政治思想，与中国及亚洲经济的市场依赖相互矛盾，“上层建筑”不符合“经济基础”，这个矛盾也会影响到安倍“改宪强军”的计划。经济重心东移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，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，陈旧的“价值观外交”，无法遏制这个过程。“民主”转型的“颜色革命”，人们得到更多的是教训，和民国初年中国的经验有类似之处。政治制度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演变结果，不是沙盘推演，有一个历史的客观性存在，而且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，西方所谓“普世”经验不能普遍适用，也与这个历史客观的制约有关联。越来越多的人，包括日本学者，开始承认“中国道路”的历史合理性，对所谓“价值观外交”不以为然，特别是经济界。日本政府“反向而行”，个别政客挑起钓鱼岛危机，下了一步“险棋”。中国如何棋胜一着？单纯用中国的“和平国家”传统去游说，恐怕不符合“主流世界”的实力哲学，反制所谓“实效控制”是必要的一步棋。同时，民间保钓运动持久不断，包括台湾。国民党当局多次向美国申明钓鱼岛主权，军队也曾计划强行登岛，马英九是老牌保钓，号称“一寸都不能让”，如今当上“总统”没了下文。如能实现国共两党高层会谈，在台湾打开一个突破口，则不仅钓鱼岛，连美日同盟所经营的“反向海上长城”也不攻自破。在经济领域，则应继续保持开放合作的态势，包括日本的经济界，所谓“政经分

⁶³ 大前研一：〈日本应该成为“品质国家”〉，《文艺春秋》2013年6月号。

离”会有难题，不得已而为之，高层领导会见企业领袖，可以发出这个重要的信息，拒之门外不是上策。

第二，在“亚洲有事”的深层，存在着中国和“主流世界”在实力增减和社会制度优劣上的较量。日本极端一派，将现代中国比作当年的大清帝国，准备另一次甲午战争。中国迅速增强的实力，冲击“主流”利益，他们从经济、军事、外交各个方面，对中国保持警惕甚至反制中国，皆为不可避免。而且“主流”皆为所谓“民主国家”，他们往往将中国的“奇迹”般的增长，归结为“异类”的社会制度，包括政府鼓励出口管制汇率之类的具体制度，也包括所谓“国家资本主义”、“一党独裁”的制度整体。美日同盟制造事端，一方面延缓或者抑制中国实力增长，另一方面还是试图“改造”中国的制度。如何在中国和“主流”，特别是中国和周边建立一种均衡关系，是今后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。

在西方侵入之前，历史上的“中国与周边”是一个中心与边缘的关系，甚至可以说是周边的“中国化”，或中国的“天下秩序”。因为那时中国强盛？也不尽然，最不服气的是日本，它通过深入学习“汉唐文化”敢把大清帝国当“夷狄”。国力增强和制度认同，不一定是线性关系。国力强盛可能增加制度和文化的认同，也可能被继续视为“异类”。况且“中国周边”，现在是“主流”和中国共存，不一定是你死我活，但是“主流”争夺主导权，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。当年冷战接替“历史终结”，中国的制度迟早崩溃之说风行，现在“主流世界”自己金融危机，债务危机，破绽百出，中国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再此得到关注。新兴经济体各国，制度多样，有主流也有“非主流”，没有完美的制度，优劣的较量，将是一个相对长期的历史过程。

“社会制度”的博弈，除了涉及贸易、投资、税制、国企等经济层面，也涉及人权、民主、宪政等政治层面。美欧日“主流世界”主导世界秩序，包括“制度优越”的话语权，核心概念是民族国家(nation state)。

欧洲资本主义兴起，对内突破宗教权威的支配，建立“民族国家”，对外则开疆拓土，殖民扩张。日本“脱亚入欧”效法西方，一方面“文明开化”，一方面“侵伐霸道”。“主流世界”具有“排他性”，或者“一神教”原教旨主义，导致强国益强，穷国益弱。不平等条约“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，即割让土地的新纪元”，甲午一战马关条约，中国痛失台湾，钓鱼岛被日本乘机“编入”冲绳，还是“民族国家”主权意识的恶用。⁶⁴丧权辱国的局面之下，近代“先进的中国人”希图“变法图强”，梦想加入“主流”，实现“三民主义”，结果继续被欺负，终于走上“中国革命”的道路。现在的中国制度是历史演进的结果，也是“主流世界”逼迫的结果，不是“沙盘推演”。近年来的所谓“翻案”、“反思”的近代史研究，不少是“非历史”研究，无非追随“主流思想”，否定自己的“道路”，中国只能往回走，回到支离破碎被“弱肉强食”的时代，或者推演到中国近代“日本化”。历史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“客观实在”（objective reality），中国制度的形成、变革和进一步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逻辑，不是“顶层设计”可以作到，“设计”的结果，很容易叫设计者自己失望。

日本是第一个非西方的现代国家，但是“脱亚入欧”只改变自己，成为西方“霸道的鹰犬”，而非孙中山当年期待的“王道的干城”。战后日本“反省”自己的“近代化道路”，但是从安倍的“历史观”来看，“反省”的效果有限。一部分日本人，确有过“兴亚”的理想、“亚洲是一个”，但是作为一个国家，其立国基础依旧“排他”，在“宪政”外衣之下，在亚洲行“霸道”之实。日本能够实现西方近代，有其历史和文

⁶⁴ 蒋廷黻悲愤地指出，“两个条约，《中俄璦琿条约》及《中俄北京条约》，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，即割让土地的新纪元。我国在咸丰八年及十年丧失的土地，其面积有四十万零九百十三方公里。现今的东三省加上江苏，比我们这两年所丧失的土地的面积，只多一千四百方公里，法、德两国的面积，比我们这两年所丧失的土地还少六千五百万方公里……”（蒋廷黻：〈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〉，《中国近代史大纲》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06 年）

化的理由，如封建幕府制度与欧洲封建相似，江户时代的思想革新存在“现代性”因素等等，这里不做深入讨论。至少中国的“近代化”，清末和民国两次被这个“东方的西方”的侵略所打断。历史可能会重复。

没有正确的世界观、历史观，也就没有正确的国家观。日本“主流”停留在“西方进步史”那里，即西方文明、东方中国落后。部分中国“主流”学者，也是言必称希腊，数典而忘祖，忽视中国及其周边世界自己曲折发展的历史。随着经济复兴，近代衰落的中国~亚洲文明，呈现复兴的征兆，“东方的西方”熟视无睹。安倍的世界观，决定了他的政策，并使中日关系几乎倒退到“冷战时代”。他们相信“TINA”即别无选择，后发国家有自己的选择，建立自己的国家实力和社会制度，包括民主实践。“接轨”“主流”体系，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通之路，只能探索自己的道路。而且，在民族独立、国家统一的意义上，中国的“民族国家”，或许不是1912年民国成立，而是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起点，群雄割据的“民国史”，是这个统一的“民族国家”形成的“史前史”。不过，中国这个“民族国家”，不同于西方近代，没有“侵伐霸道”和对外扩张，超越“民族”和“地域”的排他性，具有传统“天下国家”和“天下大同”的社会主义指向。或者说，以“王道”聚合多民族国家，超越“西方近代”，比如日耳曼德国、大和民族日本那样的“霸道”。社会主义的立国理念，与中国传统的“天下国家”具有相通之处，区别在将皇权转变为民治，走向一种新型的“天下国家”。

马列经典的“国家论”说：“国家不是黑格尔‘道德观念的现实’或‘理性的形象和现实’，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的表现……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政治外壳……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”。⁶⁵ 中国以革命方式“打破”旧的“国家机器”，“代替物”却不是经典作家的“国家

⁶⁵ 列宁：〈国家与革命〉，《列宁选集》第三卷上，人民出版社1962年，第166~173页。

的消亡”。经典的“国家论”遭遇“社会主义”也有“官僚制”（“科层制”）的挑战，即韦伯所谓近代社会组织的“普遍官僚制”，国家、企业皆不可避免。“官僚制”具有“正功能”，也具“负功能”或者“失去功能”，官权的“绝对化”，即“官僚制”的“负功能”，渎职和腐败即“失去功能”。而且，中国传统皇权之下的官僚制弊端，也是史不绝书，明清之际的唐甄说：“天下难治，人皆以为民难治也，不知难治者，非民也，官也”。⁶⁶ 新型“天下国家”如何在“普遍官僚制”中实现“超越”也是法制和政治民主的基本课题。

第三，应对“亚洲有事”的外部挑战，取决于国家实力和制度建设，而不论国家实力还是制度建设，“中国道路”的核心是共同富裕及其价值重建。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，是世界最大的市场，共同富裕首先意味着“经济人口”和市场的扩大，从沿海到中部、西部，这是中国最大的实力。中国巨大的市场机遇，前所未有的，无可替代。现在，日本出口的20%在中国，加上香港、台湾的“大中国区”则占日本出口的30%，事实上经济高度一体化；亚洲地区，比如ASEAN 10+3地区，区内的贸易比重高达60%，事实上已经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，和历史上布罗代尔所谓“中国世界”相似。“中国世界”的贸易和合作纽带，重新扩展到印度洋、阿拉伯伊斯兰世界、非洲世界和西方世界，带动着“多数人的现代化”。

共同富裕除了意味着可持续增长，也意味着社会公平，及其社会价值的重建。市场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，解决不了社会公平；优胜劣败，适应于市场经营，不适应于社会政策；一部分人“先富起来”多数人“弱势群体”，难以持续。“主流国家”包括日本，也在不断“修正”资本主义，实施“反市场主义”的社会政策，增加“社会主义因素”。中国不能只“接轨”市场，不“接轨”社会政策。“共同富裕”需要“底

⁶⁶ 唐甄：《潜书·梃政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。

层设计”，即将“共同富裕”具体化为一系列制度安排，解决包括教育、医疗、司法、城乡社区行政服务、“农民工”的市民待遇等等。“底层设计”是一切“顶层设计”的基础，也是约束权力、清除腐败，建立一个公正社会的基础。

共同富裕是发展的普世价值，底层社会不能固化。西方“主流”经典资本主义，没有共同富裕的说法，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，当然带来其他社会和底层社会的固化趋向。中国的共同富裕，改变市场经济的传统话语，来自社会主义理念，也来自“天下为公”的平等观。对主流来说，“中国道路”和“亚洲价值”一样都是“伪命题”，实际上，普遍或者“普世”，存在于中国和亚洲“特殊”之中，特殊即发展的普遍。帕森斯的社会行为理论，⁶⁷ 环境、个人、社会经济、文化四个子系统，相互依存、作用，而“系统性变迁”首先来自“差异”，一个从“差异”、到“升级”、再到“价值普遍化”的历史过程。“主流”否定“亚洲价值”和“中国道路”的“生存权”，其实，资本主义自身走向普遍化的历史，也有一个“特殊”到“普遍”的过程。

第四，面对“主流世界”的既有秩序，“中国道路”实践需要“中国思想”，这是一个理论课题，也是一个现实课题。中国的改革开放，首先就是一个哲学问题。“摸着石头过河”是“方法论”，“岸在哪里”是“本体论”，“方法论”解决不了“本体论”问题。按照经典的资本主义方式走下去，13亿中国人，买什么，什么贵，卖什么，什么便宜。“重返亚洲”和设定“自由与繁荣之弧”，无疑有资源能源的计算。比如，福岛核电事故之后，日本火电的比重加大，天然气需求剧增，美国页岩气开发成功，为日本提供了“底气”，但是石油还是来自那个“弧”，

⁶⁷ Talcott Parsons (1902~1979)，师从韦伯，研究马克思，一生研究社会价值如何引导个人行动的行为理论。1980年代，何维凌和笔者共著书中，对他的理论有过专门的评介（见何维凌、黄晓京著：《通往社会科学的前沿》第四章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）。

所以南海问题不是“他人之事”。邓英淘提出的关于体制选择、发展方式、国际战略格局的“三体问题”，即解决“本体论”问题一个思路。在资源能源的硬约束之下，不仅中国“大象”无法和日本、东亚新兴经济体“跳蚤”比弹跳，而且史无前例的“多数人的现代化”，在发达国家控制主要资源的格局不变的条件下，无法走西方“经典的”发展道路，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制度选择。⁶⁸

这个“中国的制度”到底是什么，关于这个“本体论”问题，需要中国思想和“主流”思想的碰撞，从历史和理性的两个方面找到答案。黑格尔在《历史哲学》说，历史的实在有其自身的“精神性格”，“理性是世界的主宰，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”。⁶⁹在他那里，中国缺乏“理性精神”，非洲不是“世界历史”的对象，但同时他承认“亚洲最为特异的，便是它没有闭关自守，将一切都送到了欧罗巴洲。它代表着一切宗教原则和政治原则的开始，然而这些原则的发扬光大则在欧罗巴洲”。⁷⁰黑格尔在“主流”和“非主流”之间，偏向于欧洲中心，同时又指出欧洲文明的亚洲起源。从中国史的前例来看，黑格尔以来的“主流思想”，就如同中国传统体制中的“朱子学”，西方“主流”的“四书五经”维护“主流”霸权之下的国际秩序，美国则类似中国的“皇权”支配。这个秩序发源于3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，经过欧洲“霸权”起落、19世纪“英国霸权”、到20世纪的美国。“最难改变的是美欧决定的世界格局”，⁷¹还有他们的“精神性格”。皈依“主流”的中国学者，恐怕已经将西方的教条当成“四书五经”，在那里继续“科举考试”时代的追求。黑格尔还有“否定的意志”之说，这种意志“在破坏某种东

⁶⁸ 杨莹、王小强：〈邓英淘：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〉，邓英淘：《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》。

⁶⁹ 黑格尔：《历史哲学》绪论，王造时译，上海世纪出版社2001年，第8页。

⁷⁰ 黑格尔：《历史哲学》第104页。

⁷¹ 张木生：〈中国的世界秩序〉，《参阅文稿》No. 2013~30。

西的时候，才感觉到它自己的存在”，⁷² 法国大革命是“绝对否定的自由意志”，而“中国道路”也包含着对西方“主流”的否定意志，⁷³ 但不是“绝对否定”。中国的思想需要一个融合中西，破除西方教条的思维定式，一个由里而外自我更新的“普世”过程。

“历史终结”的弗朗西斯·福山新著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，纪念他的老师亨廷顿，亨氏的著作《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》，曾经影响到中国改革。福山写道，亨廷顿的书出版之后，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，像东亚的经济奇迹、全球共产主义的衰退、全球化的加速，以及亨廷顿所谓“第三波的民主化”。因为涉及到政治发展的主题，福山参加了美国主导的“全球化政治重建”，包括阿富汗、伊拉克、索马里和太平洋岛国的美拉尼西亚等等。这些经验终于使他明白，所谓“现代性”政治的植入，结果一片混乱；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发生的事，仍对政治的性质产生影响；部落社会的共识，超过国家形态的权力。中国的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发展，成为他认识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案例：中国的“现代国家”早在秦汉时代形成，“秦朝凭借其政治权力所建立的强大现代国家制度，不但活跃过了汉代的贵族复辟，而且在事实上定义了中国文明”……“后续的中国政府学会了收敛，学会了和现有的社会力量并存不悖，在这一方面，它们是专制的，但不是极权的”。⁷⁴

他在该书的结论部分指出，亨廷顿已经摧毁了“现代性”。亨廷顿认为，“现代性”的好处不一定相得益彰，尤其是民主，对政治稳定而言，不一定是好事。他主张，政治秩序优先于民主，发展策略是“权威过渡”（authoritarian transition），也就是土耳其、韩国、台湾、印尼

⁷² 黑格尔：《法哲学原理》，商务印书馆1982年，第14页。

⁷³ 黄晓京：序章〈方法的日本和亚洲的文化革命〉，《方法的日本》。

⁷⁴ 弗朗西斯·福山：《政治秩序的起源：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》第八章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，第126、145页。

所走的道路。这种思想在 1980 年代的中国也曾一度占据重要位置，而被“六四风波”所打断。福山用“国家建设”，代替了他老师的“政治秩序”，他指出，经济增长和民主的关系可能不是线性的，高增长未必民主，“凝聚的国家和良好的统治，是经济增长的前提，民主是否发挥了同样的作用，就有点含混不清”。具体到中国和印度，他说民主的印度，很难发展公共设施，道路机场供水系统，因为既得利益者借用法律和选举来阻挠；中国经济上迅速增长，强大的国家，但缺乏法治和负责制。他对于中国依旧充满疑问，这样的情形是否能够持续？虽然“权威制度可能不时地超越自由民主制，而这仍是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，其负责制只朝上，不朝下”。⁷⁵

对于“历史终结”福山的“现代性”反思，“东洋史家”宇都宫清吉在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中，倒是早就（1947 年）总结了一段有意思的“理论”，他写到，“历史是永远没有终结的终结。这话的意思是，历史一方面可以在发展的模式下去理解，一方面又有已经完结的模式……历史中的终结正意味着开始”。⁷⁶从他这个“理论”出发，福山所怀疑的“权威制度”问题，涉及到秦汉的所谓“韦伯式国家”是“发展的模式”还是“已经完结的模式”，也涉及到内藤湖南所谓“中国近世”的早产的资本主义，以及“西方近代”之后中国“国家形式”的历史演变，这些社会史的问题值得继续探讨，和“历史的重新对话”。“中国道路”的实践前无古人，又与“没有终结的终结”的历史相关，或许需要以“发展的模式”去理解。处于一个历史的“转型”时代，“迎合”还是“自主”，这是一个问题。“理性的和平”国家（费正清语）及其天下“大同”“为公”的文化基因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实践，为“中

⁷⁵ 弗朗西斯·福山：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第 30 章，第 472、474 页。

⁷⁶ 宇都宫清吉：〈东洋中世史的领域〉，见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选译》，第一卷《通论》，中华书局 1992 年，第 122~134 页。

国道路”提供了历史“客观实在”，超越“左右”走自己的路成为历史的选择，而且主导权在中国自己，而不在霸权和走卒之手。

中国的制度建设，眼下的关键在收拾天下人心，改变官风民俗。一般说来，中国人没信仰，指的是特定的宗教信仰，实际上中国人有信仰，几千年来信仰“上天”，而“上天”和天下民心同构。这也是“天下国家”成立的信仰基础，超越一般宗教，诸如西方的“上帝”或日本的“神道”。得民心者，得天下，朝代更替，民心所归。现在的“天下民心”在共同富裕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变“只朝上”的官僚为“朝下看”的“底层建设”，关系民心所向。顾炎武目击朝代更替慨然叹曰：“目击世趋，方知治乱之关，必在人心风俗。整顿风俗，则教化纲纪不可阙焉。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，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”。⁷⁷ 黄仁宇“大历史”说到近现代，国民党构建一个“上层结构”，共产党构建一个“底层结构”，二者相互连接，未尝中断，而“底层”建设者，得民心而得天下。“中国道路”能否走通，归根到底是历史的、民心的选择。

⁷⁷ 顾炎武：《日知录·卷四·与人书九》。